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 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第一节 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

一、日本加紧诱降活动

日本在决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新侵华方针后，便加紧实施诱降策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诱降活动是日本侵华的最重要内容。

为达成目的，日军制定了各式的诱降计划，建立了专门实施的特务机关，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诱降行动——“和平运动”。

早在攻占武汉以前，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就制定了旨在分别诱降中国各类势力的“谋略计划”。该计划内容庞杂，涉及面广，各项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阴谋都取了代号。第一部分定名为“鸟工作”，要“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酿成强有力政权趋势”，目标是在政治上削弱抗战阵营，在中国建立较有影响力的伪政权；第二部分定名为“兽工作”，要“使蒋政权统治下的杂牌军瓦解归顺，削弱其势力”，目标是在军事上分化抗日力量，被其列入拉拢名单的有：宋哲元军、韩复榘旧部、东北军旧部、阎锡山军、石友三军、刘建绪军、徐源泉军及其他武装团体；第三部分定名为“山工作”，主要是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军队进行拉拢；第四部分为利用银行破坏法币，以扰乱中国经济^①。

为实现阴谋计划，日本决定设置代号为“竹机关”的“对华特别委员会”，由上肥原贤二中将主持（故又称“上肥原机关”），专门负责在华的各项政治、经济“谋略”活动。

土肥原起初计划策动唐绍仪、吴佩孚等出面组织“中央政府”，作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并作了不少努力。当时，曾在民国元年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居住在上海，上肥原竭力拉拢唐出山组成伪政权，但国民党军统派人以利斧将唐劈死。吴佩孚在与土肥原的接洽过程中，坚持要日本从中国完全撤军，并附加了一些条件，土肥原难以接受，以至前后经过半年多仍未有结果。后又想撮合吴佩孚同汪精卫结盟，也没成功，土肥原无可奈何地叹道：“可恶的吴佩孚已经没有希望了！”吴佩孚于1939年12月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而死，土肥原的计划受挫。

日军还试图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矛盾，分化抗日力量。1939年下半年战火燃至广西境内，日军深知桂系和蒋介石有宿怨，而两广曾聘请过日本军事顾问，便想实施谋略，特派当年在南

① 参见龚古今、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4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宁担任军事顾问的中井增太郎大佐出任前线部队的特务机关长，中井派出代表与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密谈多次，得到的印象是，三人“对更换蒋介石并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慎重，不可轻举妄动”。^① 中井也发出“致李、白将军书”，威逼利诱，李宗仁等人义正词严地指出：“日本穷困的情况，中国是非常清楚的”，“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战争的停止当然必须也应该由日本提出。……如果真正希望停止战争，必须恢复战前的一切状态。”^② 回绝了日军的诱降。

对桂系拉拢招降工作只是前线部队的短期行为，而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则是由陆军部负责，“并曾抱有希望，领导了该项工作”。^③ 由于阎锡山的代表是其侄子，谈判过程中称阎锡山为“伯父”，故日本把对阎的诱降活动命名为“对伯工作”。日本利用阎锡山军固守山西一隅，困难重重，阎本人生性多变的情况，对阎锡山展开了强大诱降攻势，由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具体实施，“以极大热情努力推动工作”。阎日双方在1941年9月签订了“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规定日本向阎锡山部队提供军费、武器，阎锡山则发表独立宣言，声明与重庆政府脱离关系。双方一度联系频繁，后日军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无力付给允诺的军费，曾毁约向阎军发动进攻以施加压力。1942年5月6日，阎锡山与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在安平村会面，但未达成实质性协议。此后日军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仍企图使阎锡山投降，还把阎在安平村和日军军官会见的情况印成传单，广为散发，以“离间阎蒋关系”。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日军与阎锡山仍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但日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505页。

②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506页。

③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第174—183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本终未达到使阎锡山公开脱离抗日阵营的目的。

当然，日本要达到其侵略目的，最直接的办法，还是诱降蒋介石领导下的重庆国民政府。为此，日本很快就放弃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对蒋介石个人的出路，日本也不断让步。第二次“近卫声明”中，仍要中国改变政策，“更换人事”，即蒋介石下野。第三次“近卫声明”就放弃了此条件。后来，日本又通过华北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之口透露出下列信息：“尊重蒋介石上将的地位，而给予崇高的位置。”

为能和重庆政府谈判，日本寻找了不少渠道，千方百计与重庆方面的人士接触。如日方代表在香港、上海与孔祥熙的心腹乔辅三、樊光的接触；通过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重庆政府联系的“司徒雷登路线”；企图利用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等作为居间调停人的“钱永铭路线”等等，是其中较有影响的。^①但上述接触中，都没有取得实际结果，多是无疾而终。

日本和重庆国民政府真正坐下来谈判的，仅有一次，即 1940 年的“桐工作”——双方在香港等地的接触。

1939年底，日本参谋本部派铃木卓尔中佐为机关长（公开身分为武官），要他设法和重庆国民政府建立联系。铃木履任后，与自称是宋子文弟弟、西南运输公司主任宋子良的人搭上了线，经过互相摸底，双方均表示愿意进一步“谈判”。日本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谈判计划，并把此次谈判定名为“桐工作”。1940年3月7日，双方在香港举行预备性会议，日方出席者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代表中国派遣军）、白井茂树（代表参谋本部）；中方出席者为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和宋子

^① 具体经过见《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5月，第182页～198页。

良。^①

谈判开始，中方提出 3 项条件：日军必须保证撤兵；日本明确“和平”的条件；会谈绝对保密。经过 4 天讨论，日方提出了备忘录，要中方代表签字，中方却在最后关头提出了名为“和平意见”的 8 条修正案，要日方代表签字，结果双方争执不下，没有形成共同签字的文件。

6 月 3 日，双方在澳门举行第 2 次预备性会议，在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聘请日本顾问”等问题上达成谅解，但在日本要求的在华北驻兵权，中国承认“满洲国”，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等问题上却有分歧。接着，双方又开始筹划由蒋介石、汪精卫、板垣征四郎 3 人参加的高层正式谈判。但此后，重庆方面的热情大减，并提出以日本须在“满洲国”和在华驻军问题上让步作为继续谈判的前提。日本方面觉得蒋介石缺乏“诚意”，陆相烟俊六于 10 月 1 日下令“军方立即与和平工作断绝关系”。“桐工作”正式收场。^②

综观日本诱降活动，虽然拉过去了少数卖国求荣的汉奸，但结果与日本政府的预定目标有很大差距，多数正直爱国的中国人都不为所动，坚守了抗日阵营。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未与日本签订卖国协定，但在民族战争如火如荼的情形下，与日方的这些接触，在民众的心理与士气方面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二、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

汪精卫是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第 2 号人物，时任国

^① 据《今井武夫回忆录》，“宋子良”是由军统特务装扮顶替的。见该书第 180 页。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79 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副总裁、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一向主张对日议和，被人视为“亲日派”的代表。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通过妥协来与日本停战的集团，其主要成员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侍从室第2处副主任周佛海，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他们在各种场合下宣扬“抗战必败”、“抗战必亡”的消极悲观论调。

汪精卫集团对陶德曼调停充满幻想，调停失败后，他们惟恐与日本联系的管道被切断，急于要恢复与日本的“和平谈判”，由高宗武利用职务之便秘密与日方有关人员接触。1938年7月初，高宗武在周佛海授意下，从日不控制下的上海出发，秘密访问了东京。高在日本会见了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得到了日本希望在蒋介石之外的国民党要人中寻找议和对象的信息。板垣征四郎还让高宗武带信，表示日本愿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为“和平运动中心”。高宗武回国后向有关上级汇报，蒋介石对此大为恼火，但汪精卫、周佛海等却因此摸清了日本的底，决心继续联系，争取谋和。

同时，日本政府已经把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以尽早结束战争作为战略方针提出来。7月12日“五相会议”上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提出了以“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为谋略要点，在华“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决心以政治诱降推动军事侵略的步伐。^①

^① 《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载《汪精卫集团投敌》第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

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试探摸底，汪精卫等人与日方已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武汉、广州失陷后，汪精卫的“抗战必败”理念更加坚定，他甚至公开向日本求和乞降，说什么“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①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除继续威胁如国民政府坚持容共抗日政策，“则日本不到将其消灭断不收兵”外，也有“倘国民政府能放弃向来的指导政策，更换人事，实求新生，来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的内容。^② 修改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既定方针，汪精卫集团视此为与日本谈判“和平”的好时机，当月初派高宗武、梅思平为全权代表，赴上海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进行投靠日本前的预备会谈。会谈在日方安排的重光堂进行，主要讨论双方所能开出和接受的条件。高宗武等提出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主要内容是：汪精卫借机逃出重庆；日本发表声明提出“和平”的先决条件；汪发表断绝与蒋介石关系，呼应日本的声明；云南、四川、广东等地的军队响应汪的号召“起义”；汪精卫等在中国南部日本尚未占领地区建立新政府。^③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1月20日以高宗武、梅思平和今井武夫、影佐祯昭（陆军部军务课课长）个人的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等3个文件，即所谓“重光堂密约”，并制定了汪精卫等逃出重庆，脱离抗战阵营的具体步骤，约定一俟汪精卫等叛逃成功，便由近卫首相再次发表对华声明，汪精卫通电响应。

○ 《申报》(1938年10月22日)。

② 《日相近卫“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声明》，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32页。

③ “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载《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8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重光堂会谈结束后，梅思平回到重庆向汪精卫报告结果。经密商，汪精卫一伙终于决心卖身求荣，他们拟定了分别离开重庆逃往越南河内或香港的计划。12月1日，梅思平到香港向日方报告，汪精卫已承认重光堂的协议，决定逃出重庆，投靠日本。^① 在一番紧张的策划后，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等人从昆明乘龙云代租的飞机逃到河内，走上了叛国之路。

日方获悉汪精卫到达河内，便按约定于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表示日本虽准备“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但也希望和“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并提出了“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合作的条件（即“近卫三原则”）。^② “第三次近卫声明”所提的3项条件，均在“友善”的词藻下包藏着险恶的祸心，而所以在用词方面比以前稍有和缓，目的在于迅速引诱汪精卫一伙下水。而汪精卫也在叛国的路上越走越远，12月29日竟以向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通电的形式响应“近卫声明”，并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公开发表（因29日的电报代码为“艳”，故该通电又称“艳电”）。汪精卫在“艳电”中完全为日本的侵略政策辩护，不顾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的事实，竟说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还将帮助中国“能完全其独立”。他要求国民政府能以“第三次近卫声明”为蓝本，与日本交换“诚意”，则“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③ “艳电”公开为侵略者唱赞歌，为自己的叛国行为涂脂抹粉，它的发表说明汪精卫等已彻底与日本合流，走向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对立面。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9页。

② 《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载《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68页。

③ 《汪兆铭手书主和之艳电》，载《傀儡组织（三）》，第53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汪精卫等人以为，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内不乏希望与日本妥协讲和者，凭汪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影响及地位，一旦他起而号召，定会有人紧随其后。但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叛国行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云南的龙云在 19 日送走汪精卫等后，立即向重庆作了报告。而在“艳电”发表后，汪精卫集团受到全国人民的声讨。一些原与汪关系较好的军政人员，如广东张发奎、余汉谋，云南龙云等也纷纷通电，斥责汪精卫，“谬论谬辞，为敌张目”，卖国求荣，要求对他“通缉归案，明正典刑，以肃纪纲而振士气”，^① 并表示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国民党在舆论的压力下，于 1939 年元旦召开临时中常会，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中称“汪兆铭承本党负托之重，值抗日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其欺蒙。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其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消一切职务，藉肃党纪，发正视听。”^② 会上不少人主张通缉汪精卫，蒋介石为留有余地，暂缓执行。

蒋介石在汪精卫出逃后曾派一些党政要人赴河内，试图劝说其回心转意，然汪叛意已决，无可挽回。于是便由军统特务在 1939 年 3 月 21 日夜袭击汪在河内的住所，企图刺杀他。不料当晚汪精卫恰巧与曾仲鸣调换住房，侥幸得免一死，曾仲鸣成了替死鬼。^③

① 《张发奎等以汪危害党国请通缉归案明正典刑之微电》（1939 年 1 月 5 日），载《傀儡组织（三）》，第 65 页。

② 《开除汪兆铭党籍决议文》，载《傀儡组织（三）》，第 125 页。

③ 事见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汪精卫集团因此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他们惟恐躲在河内难免杀身之祸，同时原来期望国民党内军政人员会响应，结果得到的是全国人民的同声声讨，极端孤立。只得求助于日军的庇护，以早日离开河内，结束终日杯弓蛇影的逃亡生活。1939年4月25日深夜，汪精卫等又偷偷潜出河内，在日军的协助下，乘船驶往日本占领下的上海。

三、汪精卫伪政权的建立

在从河内到上海的船上，汪精卫向影佐祯昭等日方人员提出，放弃重光堂会谈时所提在日军尚未占领的中国南部地区建立政权的设想，改为在日军占领区“建立和平政府”。^①

汪精卫等人到上海后，住进日军控制的地区，开始着手建立汉奸政权。他们先以《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拟定建立政权的具体步骤，同时作为与日方谈判的基本条件。汪精卫虽是在日本卵翼之下才得以立足的，但他们仍要些“颜面”遮羞，希望能盗用“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名义为未来的伪政权张目。《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其步骤为先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国民党决议的形式作为政权建立的基础；由汪精卫出面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政府”建立的时间、五院院长及下属各机构的负责人选；“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所有伪政权统一于汪精卫领导之下。^②

在筹建伪政权过程中，汪精卫等基本上是照上述办法进行的。

^① 《影佐祯昭供词》，载《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第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转引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28页。

其活动大致可分为三项：

1. 签订“汪日密约”

争取日本支持是汪伪政权建立的最重要前提。对汪精卫等人来说，没有日本的许可，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他们积极向日本乞怜，以换取组织政权的可能。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率周佛海等大小汉奸喽罗前往日本谈判建立伪政权的条件。

虽然日本在华有直接利益的各机关，如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兴亚院等在帮助汪精卫建立一个统一的汉奸政府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一些细节，如怎样保证本机关在以后对华决策中的主导权，如何利用此次机会迫使汪精卫出卖更多的中国权益等问题上却有分歧。为统一意见，日本政府在与汪精卫等会面前特召开由首相平沼骐一郎主持的“五相会议”，协议通过了《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时的依据。该方针规定，未来的“中央政府”须由汪精卫、吴佩孚、其他变节的重庆政权分子、已有的临时和维新两个汉奸政权等共同组成；须事先完全接受日本所提《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同时还提出了许多日本在华的“特殊要求”。^①

在谈判中，汪精卫面对日本的酷苛要求也颇感失望，不甘心只做全无实权的傀儡，他要求日本能遵守“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诺言，帮他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实权的、一定程度“独立”的“中央政府”，并做了有限度的抗争。但在日本的软硬兼施之下，最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设想，“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几乎是空手而返。^②

日本对汪精卫集团采取的是步步引诱的策略，所索取的要求

① 《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第86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汪政权树立工作》，载《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第40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也是层层加码，它在伪政权成立前利用汉奸们急于粉墨登场的心理，再次进行敲诈。兴亚院以汪日双方要“缔结条约奠定基础”为借口，制定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等文件，作为汪必须接受的酷苛条件，内容包括了日本对中国的一切都有控制权，连今井武夫等日方人员也觉得条件太严苛，违背了日华双方的“重光堂密约”，“超出了第三次近卫声明的精神”，“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①

1939年11月，日汪之间依兴亚院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汪精卫等对日方的贪得无厌感到震惊，他提醒日本注意，所提条件“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一些人为此痛感失望，已脱离“和平阵营”。^② 谈判过程中，汪精卫希望能得到较多的“独立自主权”，以装饰门面，而日方则强迫汪全盘接受，一度发生了激烈的争辩，致谈判中断。谈判持续了两个月，日方只在细节上稍有退让，汪精卫在日本软硬兼施的威逼之下，被迫在自称为“卖身契”的密约上签字。^③

汪精卫以全盘接受日本的酷苛条件换取了日方对其组织汉奸政权的支持。日本依密约获得了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各种特权，由于条约太酷苛，暴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双方约定对其内容“永不公布”。

2. 与其他伪政权的讨价还价

汪精卫等人原本看不起在日本刺刀下建立的临时政府、维新政府等汉奸组织，认为它们名声太臭，不愿与它们合作。然而，日本则坚持新“中央政府”要包含所有新旧汉奸政权，并强迫汪精卫

① 《今井武大回忆录》，第122页。

② 黄美真等：《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第186页。

③ 陶希圣：《未说出的一句话》，载《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第595页。

立即开始和它们会商合并事宜。

汪精卫先试图联络日本正在拉拢的吴佩孚，但两人对“中日和平”内涵的见解有差异，“立场不无稍异”，对未来新政权的权位分配也各有打算，吴佩孚对汪的人格也颇蔑视，表现较冷淡，甚至对汪不无戏弄，他在汪所送去邀请参加伪政权的信上写道：“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老虎出山人梗，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① 吴佩孚虽是失意军阀，但终于未落水当汉奸。

此后，汪精卫在日军的安排下着手与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华中“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协商合作建立“中央政府”事宜。王克敏等自恃投靠日本在先，不肯轻易就范，他们同汪争“独立地位”和在未来政权中的职位。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临时政府”改为独立性极大的“华北自治委员会”，对“维新政府”的要员委以高官才得以结束。新老汉奸终于合流。

3. 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汪精卫为使其建立汉奸政权获得“党统”根据，于1939年8月28日在上海开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汪精卫集团已臭名昭著，正直的人们耻与为伍，因而就是东拉西拽也未能凑够预定的人数。汪精卫在会上正式提出“和平反共建国”的口号，为其叛国行为辩护。会上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宣称，自1939年1月以后的国民党中央“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各级党务机关须“听候改组”；废止国民党内总裁制，改设主席一人，行使“总理”职权。会议选举汪精卫为国民党的“主席”。^②

汪伪“六大”之后，汪精卫又拉了几个“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名流”，于1940年3月20日拼凑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517页。

② 《中国国民党在沪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载《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第340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伪政府的各种机构设置、“组织条例”和人事安排，决定完全仿照重庆国民政府的结构组建伪国民政府，并用“还都南京”的名义在南京正式登场。汪精卫称会议确定了和平与宪政两大方针，“从此以后，和平运动已确立稳固基础，将来当努力克服困难，负责救国家民族之责任，实现东亚永久和平”。^①

1940年3月30日，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政权——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其主要头目分别是：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汪精卫（主席一职仍留由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担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兼）、立法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长王揖唐，其他大小汉奸也各得其所，如周佛海出任财政部长、褚民谊任外交部长等。当天发表的“还都宣言”中不隐讳其傀儡地位，称该政府要与日本共同努力，“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重庆政府已是“非法”，“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要求重庆政府的军队必须立即对日军停战，党政人员必须到南京向伪政权报到。^② 同日，“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宣布解散。

汪伪政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政权。日本在其政府的各级机构中均设有“顾问”进行控制。它在日本的压力下订立了卖国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进一步把中国变成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

汪精卫集团从出走叛国到建立汉奸政权，分裂了中国的抗日阵营，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汪伪政权成立后，全国掀起了声讨汉奸卖国贼的浪潮。重庆国民政府悬赏十万元缉拿汪精卫，称汪

① 汪精卫：《招待在京记者的谈话》，1940年3月21日《中华日报》。

② 《伪国民政府还都宣言》，载《傀儡组织（三）》，第191页。

通敌祸国触犯惩治汉奸条例，“公然与敌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狂悖行为，益见彰著，亟应尽法惩治，以正视听”。^①

四、国民政府建立战时经济体制

在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把国家经济体制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运作，集中全国所有财力、物力、人力，为抗日战争服务，是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战前中国的经济体制运作已不正常，日本军队的侵略步伐又很快，故在全国抗战之初中国政府只能进行部分应急的调整与转变。如在淞沪会战开始后，财政部即指示中央、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四大银行在上海建立四行联合办事处，尝试着将国家银行的某些功能合并；战时最高机构军事委员会内也增设了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着手对全国经济按行业进行适合战时的调整。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策定“抗战建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中，对经济问题相当关注，在其纲领性文件《抗战建国纲领》中既规定了抗战时期“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又确定了达成这一目标的8项具体措施：实行计划经济，扩大战时生产；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开发矿产、鼓励轻工业，发展手工业；推行战时税制；统制银行业务；巩固法币，统制外汇，安定金融；整理交通系统；严禁奸商垄断居奇，实施物品平价制度。^②《在抗倭战争中必须举国一致，一切建设以军事为中心，以期完成国军建设案》中强调，在“国防第一，军事第一”的前提下，国家的物质建设“自宜以极精密之筹划，行最严格的统制”。

① 《国民政府悬赏拿办汪兆铭之命令》，载《傀儡组织（二）》，第195页。

②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8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一面使工业之发展，与资源之开辟，完全适应于军事的要求，以充实其（指军队——注）储备；一面使农村的生产，尽量增加，金融的流转，益见灵活，以改善其生活，全国上下尤应厉行节约，以供军需。”^① 其它如《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工业政策实施大纲》等议案，都强调了战时经济以服务军事为中心内容。

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经济的发展也比较重视，蒋介石提出过第二期抗战的原则是“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称“我们以后经济成败就是抗战的成败”，经济部门对于抗战胜利所负的责任比军事部门更大。^② 国民党历次会议均有关于经济的议案通过，如五届五中全会的《改进财政系统，统筹整理分配案》，七中全会的《动员财力，扩大生产，实行经济统制案》，九中全会的《确定战时经济基本方针案》，十中全会的《限价政策案》等等。

国民党关于抗战经济的各项文件，奠定了战时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架。

战前，国民政府内与经济事业有关的部门很多，各守一摊，效率很低。1938年初，国民政府实行政改组，设立经济部，下辖21个行政单位，22个专业单位，包括了原来属行政院领导的实业部、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水利部分和原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第三部、第四部、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业调整委员会的各职能部门。经济部由此成为战时总揽全国经济生产大权的中枢机关。^③ 当局还扩充与改组了上年底建立的四行联合办事处，使其成为抗战时期国家最高的金融、财政政策的决策机关。机构的统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9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

② 蒋介石：《在党政训练班第八期开学典礼讲话》，载《“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7第335页，（台）国民党党史会1984年出版。

③ 《行政院工作报告》，载《战时建设（三）》，第583页。

一，是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概括起来，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体制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发展生产与统制政策。

1. 发展生产方面

和日本相比，中国的经济总体上落后很多，而发展又极不平衡。富庶的东部沿海沿江地区陷入日军之手后，中国政府要在近代工业极少的西部大后方立足，还要支撑巨大的战争消耗，供应军需民食，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通过发展生产，推动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建设，是国民政府渡过难关的最主要办法。

为开发大后方，国民政府曾先后颁布《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励暂行条例》、《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等，以提供贷款、减免税率、帮助购置原材料、招募技术工人等具体措施，鼓励设厂生产。一时间，大后方掀起了设厂高潮，1938年内新设厂数为218家，1940年为575家，1941年更达862家，1942年仍有569家。^① 新增工厂以60%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成长。新设工厂与内迁工厂结合，在国统区形成了一个包括石油化工、纺织、食品、机械、电力、冶金等上百个工业部门并基本可以自给的工业体系。

重工业生产与军需密切相关，又是民用轻工业的基础，国民政府比较注重扶植，向电力、机械、钢铁、石油等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使生产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到1941年，国统区内重工业的产值比1938年增加了60倍左右，其中工业用机器由1938年的842部增加为1940年的3755部，钢铁产量从1938年的52900吨增加到1942年的108900吨。^② 国统区重工业生产的发展，不仅支撑了大后方的经济，供应前线军需，而且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战前中

^① 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第27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版。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国重工业十分落后、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

在民族资本较为集中的轻工业部门，也有显著的增长。以1941年为例，棉纱较战前增加了3.36倍，面粉增加了2.34倍，肥皂增加了2.91倍，火柴增加了1.56倍。^①

农业生产事关战时军民的衣食，又为工业提供原材料，是其它经济事业发展的基础。国民政府也予以相当的重视。1941年成立农林部，通过扩大农田面积，推广优良品种，改进耕作技术，除虫灭灾，向农民提供贷款，加速水利建设等措施，希望发展农业生产，复兴农村经济。如在扩大耕作面积方面，大后方各省冬作田亩1944年比战前增加了20%（约5000万亩）；因兴修水利而获益的农田至1944年达1000万余市亩；改良稻种100余种，改良麦种约50种；^②政府给农民的贷款1937年为3952.9万元，1942年为62880.5万元，增长了16倍以上。^③抗战期间，国统区的农业生产有了较显著的增长，稻、麦、棉等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上升，总产量虽有起伏，大体上呈较明显成长趋势。以1939年国统区的主要农产品产量与抗战前的1936年相比，水稻产量增长了54%，棉花产量增长了77%，麦产量增加幅度最大，竟达11倍。^④

2. 统制政策

尽管国统区的经济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可是对于满足军需民用这一根本目标来说，差距仍然很大，处处捉襟见肘。整个抗战期间，军费支出占了政府总支出的60%左右，其中1940年曾高达

^①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主要工业品增长表》，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行政院工作报告》，载《战时建设（三）》，第818页。

^③ 史全生：《中华民国经济史》第43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

^④ 史全生：《中华民国经济史》第44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

78%。^①为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弥补财政不足,使有限的物质生产力能有效地掌握在政府手中,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实行了统制政策。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决定对大后方经济实行全面统制。被列入统制的物资有5大类:粮食类,包括米、麦、杂粮等;日用必需品类,包括棉花及棉制品、煤、食油等;工业器材类,包括机器、钢铁、水泥、各类酸碱工业成品及原料;外销物资类,包括用于外销、外贸的各种物资等;专卖物资类,包括糖、盐、卷烟、火柴。国民政府建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对列入统制的各类物资用统购包销、限价、专卖等方式,从生产到流通领域,实施全面管制。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延续,大后方物资供应益显困难,出现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国民政府更加注重对有关产品的统制,1942年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列出军用器材、粮食及被服用料、药品及医药器材、船舶车马等运输器材、土木建筑器材、电力与燃料、通信器材等为国家总动员物资,申明国家有权征用及征购其一部或全部,“政府于必要时得对国家总动员物资及民生日用品之交易价格、数量加以管制”。^②接着成立了国家总动员会议常务委员会作为全国管制物价的最高决策机构,由行政院正副院长、各部有关部长组成,行政院长蒋介石负责召集。

当局实行统制政策,是要用政治力量干预生活,平抑供需之间的差距,维持政府基本运作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如粮食是军队、平民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又是工业生产的基本原料,国统区的粮食产量供不应求,因此粮价常常上涨,如1940年6

①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第278页。

② 《国家总动员法》,载《战时建设(三)》,第478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月的粮价比半年前涨了1倍。^① 粮价上涨后，军费就要相应增加，如此循环，政府不堪负担。为纾缓由粮价上涨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国民政府于1940年8月专设全国粮食管理局，在各省设粮食管理局，县设粮食管理委员会，至次年7月，再裁粮食管理局，专设粮食部，以提高其地位，增加其权力。各级粮管部门以限制粮价、田赋征实等手段对国统区的粮食实行统一管制。田赋征实，就是规定农民将应缴的田赋款额按战前的粮价折合成粮食实物，以缴粮食取代缴款。在粮价已大幅上涨后，仍以战前较低的物价比来强迫农民多缴粮食，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农民的掠夺。据统计，仅至1941年底国民政府就以13.3亿元的支出，征得了当时价值42.52亿元的粮食，实际上是将29.2亿元的差价转嫁到了农民头上。^②

国民政府以战时经济体制扶助生产，一面开源，一面节流，对中国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八年抗战是有贡献的。但是，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弊端很多，一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当局投资和扶植的重点是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重工业，而民族资本为主体的轻工业受到的照顾较少，结果到抗战后期，中小企业步履艰难，出现了倒闭风潮；二是统制政策和相关措施是建立在对农民、中小企业主剥削基础之上的，如统购包销时，对产品的收购价核定过低，有时甚至不及成本，严重挫伤了中小企业主的生产积极性，田赋征实也是把通货膨胀的恶果转嫁到农民头上；三是政府发展经济的政策仅停留在宣传上，不少措施完全靠政权的强力去推行，违背基本经济规律，执行过程中贪官污吏又从中渔利，因而抗战后期国统区内出现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曾对

^① 王洪峻：《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第140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633页。

战时经济政策作出检讨，认为田赋征实作用极大，“在全部抗战史中，实有其不朽的纪录”。但物价管制则总不见大效，而安定金融、增高生产、补助内迁工厂、节制私人资本、裁抑地主兼并等措施，却由于各种内外因素肘掣，均“未能收获预期的效果”。^①

五、战时交通事业的发展

现代战争是交战双方综合国力的抗衡，而综合国力的运用和全民动员，依赖交通甚多。交通运输对于战时军队及军需品的调动补充，人力物资的转移，资源的开发利用，粮食及日用品的调运等等，都有重要作用。中国要在抗日战争中充分利用有限的国力战胜强大的日本，须首先改善与发展交通事业，然而，战时的交通事业是在两难的境地中发展的：一方面亟需迅速大力兴建；另一方面中国却缺乏兴建交通（尤其是铁路）所需的材料、资金和技术人才，需要外国的支援，当时的国际交通线又多为日军阻断，筑路所需的国外钢轨等不易运入，往往要拆旧轨铺新路；战时物价、工价高涨，筑路费用比战前高出数十甚至数百倍；西南西北地区地质情况复杂，施工条件恶劣，常常事倍而不能功半，所有这些，更增加了发展交通的困难。^②

抗战时期交通事业的发展在时间上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武汉广州失陷前，主要是加紧修筑战前已经开始修筑的铁路公路，以应各战场军队、军需品调动及机关工厂转移之急需为目标；此后则以保持与国外联系，维持对日军作战及国民政府的生存为主要目标。

1. 武汉、广州失陷前

① 吴铁城：《对国民党六全大会党务检讨报告》，载《战时建设（三）》，第305页。

② 《交通部长张嘉璈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所作交通部工作报告》（1942年10月23日），载《战时建设（三）》，第999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中国的近代交通事业比较落后,是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的交通运输已有一定的进步,当局在规划新的铁路公路网线时,也曾把未来战争需要作为考虑因素。但因种种原因,修筑速度缓慢,离满足战时需要尚有较大距离。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督令各筑路工程加快进度,并建立相应指导机构。

在公路方面,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8月专门召开后勤会议,紧急布置在苏、浙、皖、赣、鄂、闽、鲁、晋、陕、豫、冀等11省内赶筑与作战运兵有关公路线3600余公里,并分南北战场确定了各自最紧急的工程,北战场方面是河北省内沧(州)石(家庄)、德(州)石(家庄)等4条军用公路,要求在20天内能够简易通车;南战场方面是抢修江苏、浙江省内各公路干线上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桥梁。^①当时公路的抢筑工程主要由全国经济委员会督导实施。这些应急性的工程,对抗战初期部队的转运起了一定作用。1938年内,当局在公路建设方面的着眼点是为武汉会战作准备,赶修武(汉)长(沙)和(武)汉宜(昌)两条公路干线,及武汉临近地区公路网的建筑。同时,为保证弃守武汉后后方与前线部队的联络,及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联系,也着手对西南、西北的公路进行整理改进。结果武长、汉宜两路工程在武汉弃守前不久竣工,使武汉的军民物资顺利运出。

在铁路方面,因临时筹建不易,主要加紧在建工程的进度,抢筑几条最重要的路段:一是实现浙赣铁路全线通车。该路已经基本完成,但铁路公路两用的钱塘江大桥尚未竣工,淞沪会战爆发后,当局急令加快施工进度,钱塘江大桥终于在10月完成通车,大

^① 侯家驹:《抗战时期我国交通建设》,载《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1937~1945)》第169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5年12月。

大增加了浙赣路的运力。两广的军队多通过此路奔赴前线战场，北方及上海的重要战略物资器材也多经由此线撤退至西南后方。中国军队自上海撤退后，为防铁路被敌人利用，主动将大桥炸毁。二是接通粤汉线与广九线。这两条铁路都以广州为终点，然而车站却分建在城东和城西，给香港经广州转运内地的物资运输带来很多不便。抗战开始，香港成为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重要口岸，为节省运输时间，当局决定将粤汉线和广九线连接起来。同时，还修建了广州至黄浦港的支线，加快了物资北运的速度。三是沪杭甬铁路杭(州)曹(娥江)段，于1937年11月完成该段80公里的铺轨。四是京赣铁路安徽、浙江境内的路轨在1937年11月前全部铺设完毕。五是同蒲铁路方口至大同段152公里的路轨原定在1937年11月通车，但因战火已燃至山西境内，无法完成。除了赶筑线路之外，铁路工人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冒着极大的危险把即将沦陷地区的路轨拆毁，连同机车一道运往后方，既防止日军利用，又为将来后方铁路建设保留了大量的原材料。

2. 武汉、广州失陷后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局相对稳定，但中国的交通环境，特别是与外国的联络却更恶劣，国民政府为其生存计，重视交通事业的拓展，尤其是“求取国际路线”的发展。^① 一方面使国外的军事援助能源源不断地运入，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国内农矿产品的出口换汇。在东部沿海、沿江国土沦陷的情况下，建设国际交通线的重点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两地区的交通线均由铁路和公路构成。在加强铁路公路修建的同时，还开辟了数条国际航空线。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对战时交通的发展也较重视。1940年3月，蒋介石鉴于交通运输形势不断恶化，特召开了交通运输会议，

^① 龚学遂：《战时交通史》第9页，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统一领导所有与交通运输有关的机构,以提高效率。运输统制局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任主任,交通部长张嘉璈等为副主任,后方勤务部长俞飞鹏为参谋长。该局成立时,蒋介石亲自对高级干部训话,强调运输事业比前方军事还要重要,他说:“须知今后我们抗战之胜败,不仅决于前方将士之战斗,而要看前方作战所需之一切补充与接济,后方之交通运输能否尽速源源赶上为断!否则,前方虽有很多军队作战,因运输接济不济,亦必归于失败!”^①以后他又强调,“交通事业对于今后抗战,关系更加密切”!^②

在西南,交通建设的主要目标在于使通过越南、缅甸两国进入我国的外援物资能迅速转运至重庆或前线各战区。当时经越南进入中国的外援物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当局为缩短运输距离,决定修建湘桂铁路(自镇南关至衡阳),接通原有的滇越铁路和粤汉铁路。经与法国政府协商(时越南为法属殖民地),决定法方负责越南境内的全部工程,并提供中国境内第一阶段铺设镇南关至南宁段所需的部分材料。因战局及经费关系,整条湘桂线又划分为四段:衡(阳)桂(林)段,长361公里;桂(林)柳(州)段,长174公里;柳(州)南(宁)段,长260公里;南(宁)镇(南关)段,长234公里,各段开工、竣工时间不同,日军为切断中国的这条国际通道,常常以飞机狂轰滥炸,并在北海登陆,直攻南宁,筑路工人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冒着枪林弹雨工作,终于在1939年10月大致完工通车。此路之修通对外援物资的运入提供了较大的便利,南宁会战期间,中

① 《蒋介石对军委会运输统制局高级职员讲话》(1940年4月20日),载《战时建设(三)》,第946页。

② 蒋介石:《在党政训练班第八期开学典礼讲话》,载《“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7,第335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国第5军机械化部队利用湘桂线快速赶赴前线，在昆仑关与敌军激战，日军占领南宁后，湘桂铁路部分路段拆毁不复利用，但北段仍发挥作用。当局为充分利用湘桂铁路，联络已有西南铁路网，又决定修筑黔桂铁路，由贵阳通柳州全长460公里，该路1939年4月动工，至1944年也只完成柳州至都匀约3百公里路轨的铺设。另外，当局还希望通过修建川滇铁路（由四川宜宾至云南昆明）将原滇越铁路延伸至四川，修建滇缅铁路使经缅甸的援华物资不致因交通而耽搁。所以在1938年底同时动工修筑该两路，但川滇铁路后因经费不足，完成昆明至沾益段，能够转运从印度空运物资后便停工，而滇缅铁路则因英国政府迟疑不决，进度缓慢，至日军攻占缅甸，也仅铺下很少的路轨。

西南原有桂越、滇越公路。从越南缅甸运入外国援助的军需品，构成了主要的国际交通线。1940年法属越南当局对日本屈服，不允许中国物资过境，桂越、滇越公路遂失去了国际交通线的功能。当局动员15万民工用7个月时间建成的长达959公里的滇缅公路，便成了中国在西南对外联络的唯一通道。但滇缅路的作用时常受到英国对日本政策的影响，1939年英国受日本胁迫，封锁了滇缅路3个月，其后英国又重开该路，并帮助中方整理路运状况，提高了运输能力。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后，滇缅路被切断。此后为向中国军队提供支援及反攻缅甸，中美两国以军队工兵为主，开始修筑由印度雷多经缅北至昆明的中印公路（亦称“史迪威公路”），同时铺设输油管道。该公路沿线地形十分险峻，工程艰难，经中美双方共同努力，逐段施工完成，全路自1943年开工，至1945年才全线通车，当年2月4日，满载军援物资的车队直达昆明，受到热烈欢迎。

在西北，国际交通线主要是求与苏联的联络。陇海线是通往西北的动脉，可因沿途地势险恶，经费又严重不足，战前的进度缓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慢。从西安至宝鸡一段耗用了3年多时间还未竣工，抗战军兴，当局全力催办，才在1937年底通车。此后续建宝鸡至天水段，仍因经费难筹，工程时断时续，150多公里的路段竟用了7年多时间，直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底始竣工通车。无力修筑费用大、周期长的铁路，当局便重视在西北建公路。滇缅路中断后，西南的陆路国际交通完全中断，修建西北国际公路，从苏联运入援助物资更是刻不容缓的事。1942年起先后兴建了3条公路：康青公路，自西康的康定至青海的歇武，全长790公里，1944年10月通车；青藏公路，自青海的西宁至玉树，与康青线相连接，全长790余公里，通车时间比康青公路稍早；南疆公路，起自甘肃敦煌，止于新疆若羌，全长730多公里，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始告完工。

除了倾全力发展国际交通线外，国民政府也对大后方的交通系统依军事和经济的需要进行了整理和改建，整理工作以改造旧路为主，也适当筑些新路。如为连接西南、西北的公路网络，修筑了川陕公路（由汉中经成都至重庆）；为运输四川綦江出产的煤供应后方的工厂，修筑了綦江铁路，等等。

抗战八年期间，国民政府共建铁路5000公里，为战前中国拥有铁路总长度的40%以上；到1944年底，共筑公路13000多公里，相当于战前公路总里程的10%以上。现将有关铁路、公路的修筑营运情况列表如下：^①

^① 表中客运和货运栏中括号内的数字为运送军人和军品数。两表系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向国民党六全大会所作工作报告中有关交通部分的数字制成，原文见《战时建设（三）》，第956—983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抗战期间公路修筑营运情况表

年份	新筑里程(公里)	改善里程(公里)	客运(千人)	货运(千吨)
1937			6 245	54
1938	973	5 584	1 432	49
1939	2 583	9 802	1 141	39
1940	949	9 313	916	36
1941	2 616	11 883	484	347
1942	755	15 347	372	324
1943	1 571	16 666	3 875	324
1944	2 228	10 306	17 433	130
总计	11 675	78 901	31 898	1 303

抗战期间铁路修筑营运情况表

年份	通车里程(公里)	客运(千人)	货运(千吨)
1938	4 999	8 543(2 050)	7 350(1 249)
1939	2 144	10 282(2 467)	3 560(605)
1940	2 231	12 045(2 968)	2 636(459)
1941	2 289	14 134(2 089)	3 136(363)
1942	2 235	13 459(2 131)	3 069(380)
1943	2 325	18 972(2 984)	3 741(455)
1944	3 041	9 288(1 529)	1 611(250)
总计	19 264	86 723(16 218)	25 103(3 761)

战前中国在航空运输方面很落后。抗战开始,中国开辟了几条国际航线,分别从苏联、越南、缅甸、印度和香港等地接运物资,以补陆路运输之不足。其中尤以中印航线运输最为著名,该航线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要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条件很艰难，被称为“驼峰飞行”。滇缅路被切断后，美国支援了几百架运输机，使中印航线成为中国在南方对外联系的惟一通道，要从印度运进大量的军事援助物资，从国内运出还债的农矿产品，最高运量达每月 2 400 吨。

在战争环境下，中国要大力兴建交通事业，财力和人力都有许多困难。为应战时急需，便利用“中国旧有的工具和办法，发动人力与兽力的运输”，恢复传统的驿运，以人拉、马驮和小木船载来弥补现代化交通网运输能力的不足。^① 驿运线路主要在大后方各省一些交通落后地区，但也有两条与国际交通线相联接的驿运线路。为统一管理全国驿运，交通部在 1940 年专设了驿运总管理处，各省也设置相应的机构。1945 年初，全国驿运干线达 7 200 公里，支线达 3 万多公里。驿运以短途为主，仅 1941 年至 1942 年的 10 个月中，运输货物量达 83 万吨。^② 驿运线的发展，减轻了铁路、公路的压力，承担了大量军需民用物资的运输。

战时交通事业的发展，对保证前线所需人力物力的运输，开发大后方经济，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当时的铁路、公路基本上修筑在原来交通十分落后的中国西部地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国交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

^① 《蒋介石对军委会运输统制局高级职员讲话》（1940 年 4 月 20 日），载《战时建设（三）》，第 947 页。

^② 《交通部长张嘉璈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作交通部工作报告》（1942 年 10 月 23 日），载《战时建设（三）》，第 1003 页。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曲折发展

一、中美关系的缓慢发展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重视争取国际的同情与支持,《抗战建国纲领》中“外交政策”篇,居于军事、政治、经济诸项之前。该纲领中称,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①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政府面临种种困难,争取外援更成了渡过难关,支撑局面的重要措施。

中国政府争取的主要对象是美国。日本独占中国的侵略战争,侵害了美国在华利益;日本所奉行的法西斯主义也和美国信奉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然而美国在中国抗战之初却表现出一种软弱的妥协立场,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浓厚,害怕得罪日本而卷入战争,当局者一面希望中国坚持抗战,一面又企图牺牲中国保全其在华利益。故美国政府在对华援助问题上摇摆不定,对中国一再伸出的求援之手,反应冷漠。

1938年1月,蒋介石自汉口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请求援助,内称“中国鉴于中美间之非常友谊在此并力奋斗国家存亡一发千钧之时,其所希望美国之援助,尤属势所必然”。“吾人急迫之愿望,则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及物质上予中

^① 《国民党历次大会资料》第48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国以援助，助俾得继续抵抗。”^① 但美方并无确实回应。

为争取美国各界的广泛同情，国民政府于 1938 年底派遣在美国颇有些影响而没有外交经验的学者胡适为新的驻美大使，同时加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专程赴美求援。蒋介石在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如果美国能予中国相当数量的贷款，则中国“抵抗日方之攻击亦必获有更大之实力与效果”。^② 胡适等到任后，奔走于美国政府各要人之间，参加各类演讲会，陈述中国独自支撑抗日战争之艰辛，诉说美国对于中国抗战之至关重要。

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美国在华利益受损的程度加深，美日矛盾也随之激化。据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 (Joseph C. Grew) 统计，自抗战开始至 1939 年底，共发生日本侵犯美国在华利益事件 382 起，平均不到三天便有一次。^③ 日本政府在 1938 年 11 月发表声明，要以其独占中国的“东亚新秩序”代替各国在华利益均沾的“门户开放”，此事深深地刺激了美国。胡适等人的求援工作有了结果。次年 2 月 8 日，中美双方签订了《桐油贷款协定》，规定美方给予中方 2500 万美元的商业贷款，以购买美国商品，中方则以桐油运往美国来偿还本息。此为七七事变后美国给中国的第一次实际援助。因怕引起日本的反弹，这笔贷款不是由美国政府出面，而是以美国的进出口银行和中国的世界贸易公司的名义协议签订的。协定中还规定中方不得以此款购买美国飞机、汽油等重要战略物资。

1939 年下半年后，远东和世界形势均有较大变化。欧战爆发

① 《蒋介石致罗斯福信》(1938 年 1 月日)，载《战时外交(一)》，第 79 页。

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 706 页。

③ Joseph C. Grew:《Ten Years in Japan》P. 307. 转引自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 1911~1949)》，第 456 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后，英国深受困扰，其在远东的地位大跌，而美国则有意乘机强化在远东的作用。就在英日《有田—克莱琪协定》公布后 3 天，美国宣布半年后即将废除 1911 年签订的《美日商约》。这对英国和日本都有一定程度的打击。1940 年，重庆国民政府财政日益短缺，法币难以维持。胡适数次求见罗斯福总统，恳请再次予以中国贷款。3 月底，汪精卫伪政权建立。美国为使中国能坚持抗战，于 3 月 30 日发表了不承认汪伪政权的声明，并决定再次向中国贷款。4 月 20 日，中美《华锡借款合约》成立，合约规定美方贷给中方 2000 万美元，中方则以滇锡为抵押。

1940 年 9 月德意日同盟成立后，美英等国对日本的态度趋向强硬。罗斯福总统在 10 月 12 日声明：“美国援助被侵略者，无意屈从于胁迫，威吓而走向独裁者们所开示的道路。”^① 随后，蒋介石在重庆两次约见美国大使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表达中国希望与美英合作的意愿，除了阐述合作的若干原则外，蒋介石特别提出了三国合作的四个项目：贷款 2 至 3 亿美元给中国；美国海军每年售给中国战斗机 500 至 1 000 架，1940 年内先交付给中方 200 至 300 架；英美派遣军事、经济等代表团来华，组成合作机关，其成员由中国政府聘为顾问；一旦英美与日本开战，中国陆军全部参战，联军可以使用中国空军的所有场所。^② 由此可见，蒋介石强调与英美合作的目的，主要是想获得两国的军事、经济援助。6 月，中国政府又加派宋子文为全权代表，携同美籍财政顾问杨格赴美争取更多援助。

美国虽拒绝了蒋介石的合作要求，但其援华的步骤明显加快。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前后，美国决定再借款 2 500 万美元给中国，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12 册，第 60 页。

^② 《蒋总统秘录》第 12 册，第 64 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以缓中方外汇之急需。这笔贷款的谈判十分顺利。10月22日，规定中方以钨砂为抵押的中美《钨砂借款合约》签字。之后，宋子文又向美方提出，中国至少需要2至3亿美元的外汇支持（美方要立即支付1亿美元），少于此数则无济于事。詹森大使也向白宫报告，如果没有大宗外汇的支持，重庆政权就会垮台。^① 11月30日，日本与汪伪政权签订日汪基本条约之日，美国宣布将继续承认重庆国民政府，并予中国以1亿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分别由1941年2月的中美《金属借款合约》和4月的《平准基金协定》完成。此为抗战以来中国获得的最大一笔贷款。美方告诉中方代表，美国尚未参战，借1亿美元巨款已经是尽其全力了，“美国政府深盼此款于中国抗战前途有所补助”。^② 蒋介石得知消息，即致电罗斯福总统衷心感谢，内称“当此日本承认伪组织与日伪签订条约，正在敝国危急之秋，幸蒙贵大总统适于此时宣布贷与我国以币制与信用之巨款，所以增强敝国对侵略者抗战力量，提高我军民自信心理与安定社会经济基础者裨益实无限量”。^③

中美关系从此走上了日渐热络之路。1941年2月，由驻美代表宋子文出面，邀请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居里（Lauchin Currie）来华考察中国经济状况，研讨美援的运用。居里一行抵达重庆后，蒋介石奉若上宾，多次与他会谈，内容涉及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蒋介石把招待居里当作向罗斯福示好，争取更多援助的机会。居里在渝期间，为全面了解中国政治，还提出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晤的要求，获蒋介石同意。^④

①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38页。

② 《宋子文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12月5日），转引自《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483页。

③ 《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0年12月1日），载《战时外交（一）》，第286页。

④ 《蒋介石居里谈话纪录》（1941年2月15日），载《战时外交（一）》，第552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居里在华考察3周，深为中国人民在物资奇缺的条件下坚持抗战的卓绝精神所感动，对蒋介石也颇具好感。离华前，他以《观感与刍议》为题给蒋介石留言，提出一份内容广泛的建议，返美后曾数度发表演讲，主张美国应大力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蒋介石托居里给罗斯福夫妇带去一份厚礼，罗斯福酷爱集邮，礼品中包括收有民国以来发行邮票的邮册。^①

5月，罗斯福宣布，鉴于中国的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租借法案》将正式适用于中国。这是美国援华一个最重要的步骤，中美军事合作迈出了第一步，中国由此公开获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也可在美自由购买军火。1941年内中国在《租借法案》的名义下获得了美国拨给的2600万美元的物资。同时，中国也在美成立了专门负责采购军火的中国自卫供给公司。^②

居里离重庆时，蒋介石曾托其转请罗斯福总统代为物色才识优秀而又深得罗本人信任的人来华担任他的私人政治顾问，借以密切中美关系。5月，罗斯福推荐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的拉铁摩尔(Owen Latimore)，但说明拉铁摩尔只能以私人资格出任，不具政府官员身份。^③蒋介石愿意接受。7月，拉铁摩尔来华履任。

总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经过一段徘徊后，美国援华的态度从犹豫走向积极。

二、封锁滇缅路前后的中英关系

国民政府对英国出面阻止日本侵略寄予厚望，因为英国是战

① 《罗斯福致蒋介石函》(1941年4月9日)，载《战时外交(一)》，第607页。

②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484页。

③ 《居里致蒋介石电》，《战时外交(一)》，第725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前在华拥有最大利益的国家。然而，大英帝国因其国力日渐衰微而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下降，为维持自身利益，英国采取了妥协姑息的政策。在欧洲，英国与希特勒德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在亚洲，英国惟恐以强硬措施反对日本的侵略会招致其在远东利益受损，因而拒绝对日本实行制裁和禁运，对中国政府的经济、军事援助请求，则推三挡四，拖延敷衍。英国驻华武官戴尼斯（L. E. Dennys）曾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官员，英国在远东的基本国策就是要“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①

日军侵占中国东部沿海大城市后，英国与日本的矛盾激化，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海关收入和英国在华租界两大问题上。英国在其利益受到极大伤害的情况下，虽有所抗争，但最终却不脱以退让妥协平息事端的结局。关于海关问题，英日两国达成协议，规定日本占领区内各海关所征得的一切关税，以税务司（英国人梅乐和）的名义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关税收人首先要用于偿还中国政府以关税为担保的各种借款和赔款；中国自抗战后停止付给日本的庚子赔款，应立即拨付，以后按期照付。^② 关于租界问题，在日本封锁英租界的威逼之下，被迫将在天津英租界的4名中国抗日志士引渡给日本卵翼下的伪政权。

英国张伯伦政府在处理上述两项事关中国主权的重大问题时，完全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反对，违反了国际关系准则，是其企图在远东推行“慕尼黑政策”的明证。

英日交涉的中心在东京，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Robert Craigie）是对日妥协政策的执行者，他对于驻华大使卡尔（Orchibald Clark Kerr）向伦敦所提有关促进中英合作的建议“必加反

^① 《商震等与戴尼斯谈话纪录》（1941年7月24日），载《战时外交（二）》，第164页。

^②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462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对，破坏之不遗余力”。^① 1939年7月，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举行谈判，达成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协定内容为：“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日本军队正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斗之现实事态，且认识在此状态继续存在情况下，在华日军为确保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占领地区之治安，具有特殊之要求，并有必要排除妨碍日军或有利于其敌人一切行为及原因。在日军达成上述目的时，英国政府无意对之施加任何干扰行为或措施，并向在华英国官员及侨民明确指出，在此时机对此种行为及措施应加以控制，以确认上述政策。”^② 尽管英国政府同时宣布它将不改变对华政策，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侵华局面为合法，违反了国联历次决议，出卖了中国利益。对此，蒋介石专门致电英国《新闻纪事报》发表感想，以争取英国舆论的同情，他首先声明，“任何协定如不得到中国政府之承诺，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均丝毫也不能生效”。蒋介石针对英国普遍存在的以妥协换苟安的幻想指出，“英国欲为保护其在中国利益，即使欲作暂时的让步，亦无异于以血肉喂猛虎。即使英国想以百年来在华所有整个权益，悉数让与日本，日本军阀亦断断不能停止其侵略的行动”。他因此希望英国取明智态度，“立即停止与日本之谈判”。^③

尽管英国常常无视中国的权益与要求，中方对争取英国的支持与结盟却抱有热诚。欧洲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即让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向英政府转达同情，表示中国“愿在军事之外，以人力与物力协助一切之方式出之”。^④ 两天后，郭泰祺将此意告诉英国外

^① 《蒋介石卡尔谈话纪录》（1940年11月18日），载《战时外交（二）》，第54页。

^②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487页。

^③ 《蒋介石致新闻纪事报电》（1939年7月28日），载《战时外交（二）》第102页。

^④ 《蒋介石致郭泰祺电》（1939年9月12日），载《战时外交（二）》第32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交副大臣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贾德干仅轻描淡写地说，“中国参战与否，于英国对远东之既定政策，及远东目前形势，均无何不同”。^①

同时，日本也不以英国的有限让步为满足，它利用欧战爆发后英国更无力东顾，急于想通过妥协来保护在华利益的心理，向英国提出了封锁滇缅路的要求。

当时越南和缅甸分别为法国和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日本军队在1939年11月攻占河内，强迫已向德国投降的法国贝当政府的驻印度支那长官切断滇越铁路，拆毁路轨，并陆续封闭了由越南通往中国的各条公路，扣留了大批原来要运往中国的物资。这样，由云南昆明通往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成了中国从南方与外国联系的惟一交通要道。滇缅公路沿途地形复杂，路况较差，原本运量不大，到1940年也仅每月4 000吨。但在中越交通线被封后，其地位日显重要。日本为逼迫中国政府屈服，必欲切断这条交通线而后快。1940年6月24日，日本外务次官谷正之向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正式提出，禁止通过滇缅路向重庆政府运送军火、汽油、卡车等可能增加其抗战能力的物资，即要求英国从缅甸一方切断滇缅路交通。为达目的，日本以对英宣战及攻击香港为恫吓。^②

中国政府得讯，利用一切办法规劝英方拒绝日方要求，英国方面则对中方敷衍。7月1日，郭泰祺大使访问英外交部，重申“缅运与我抗战及英自身利害关系之重大，在道义及现实政治各方面而论，万不可不维持”。英国官员不正面作答，只空泛地说，英国“不致卖中国而自毁立场，……当坚持原则与日本周旋”。^③ 7月8

① 《郭泰祺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14日)，载《战时外交(一)》第33页。

②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468页。

③ 《郭泰祺致外交部电》(1940年7月1日)，载《战时外交(二)》，第113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日，郭泰祺再访英外交部，英方的含糊态度使郭产生了错觉，他在发回重庆的电报判断为：“英方真意在延宕，当无意接受敌人（即日本）要求，但亦不肯断然拒绝。”^①

然而，英国方面却于7月16日正式宣布，同意关闭滇缅路3个月，其间禁止由缅甸边境向中国运送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同时，也禁止自香港向大陆运输上列物资。^②

英国屈从日本压力，关闭滇缅路，对中国抗战进程有相当的影响。它不仅阻断了中国西南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使抗战急需的物资只能靠运力极差的空运来完成，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切断滇缅路之时，恰逢日军攻占宜昌并猛烈轰炸重庆，以及日本积极进行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几种因素形成合力，使重庆的部分人抗战决心有所动摇。美国驻重庆的记者写道：“中国人中关于对日和平问题的议论急剧上升，一般认为战争将在六个月内结束，政府将还都南京。”^③因此，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英国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无异于帮助中国的敌人。蒋介石也公开发表谈话指出，滇缅路的封锁并不能压迫中国向日本屈服。他说：“如果英国视为停止滇缅路可以缩短远东战争者，余复断言：其结果必更助长远东之战祸……。”^④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英日实际上成为敌对国家，英国的对日态度受美国影响而趋向强硬，中英关系也有好转。中方一直为争取重开滇缅路而努力，蒋介石在致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电报中请求：“为贵我两方利益计，从速恢复

① 《郭泰祺致外交部电》(1940年7月8日)，载《战时外交(二)》，第114页。

②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469页。

③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540页。

④ 《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44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缅甸运输路线。”^① 10月3日，驻英大使郭泰祺正式向丘吉尔提出重开滇缅路的请求，并希望能改善滇缅公路的运输条件、扩大运量，着手筹备修筑滇缅铁路。丘吉尔同意重开滇缅公路，也愿协商中方的其他要求。10月17日，滇缅路重新开放。为加强管理，提高运量，英方建议成立中缅混合委员会，管理滇缅路的一切运输。在中英美三方共同努力之下，滇缅路的路况大有好转，运量成倍增加，1941年元月运量为4 000吨，至11月增为15 000吨。所运入的物资虽难以满足抗战之需，然亦可稍解燃眉之急，对抗日军民的人心士气有激励作用。中英双方还曾开始滇缅铁路的筹建工作，后因日军侵占缅甸，整个计划遂告中止。

重开滇缅路后，中英间联系趋向密切。1940年10月至1941年5月间，蒋介石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举行了12次以上的会谈，详细讨论两国军事合作事宜，恳请英国予以经济、军事援助。多次讨论加深了互相了解，可实际成果却相当有限。

在军事合作及军援方面，英国同意派现役的戴尼斯少将来华，“名义上为使馆陆军参赞，实则与贵国（中国）参谋本部取得密切联络”，研究双方军事合作的“妥善方法”。^② 戴尼斯抵重庆后，蒋介石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等多次与之会谈，协商军事合作具体方案，中方所提的要求包括军火援助、转售飞机、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英国驻新加坡、马来亚的空军直接支援中国战场、两国共同防御云南和新加坡等；英方则热衷于要求中国战场全面反攻，使日军无力南侵，为此英方愿派军官来华帮助训练15支游击队，扰乱日军后方。1941年6月英国同意将美国所售144架Vultee

^① 《蒋介石致丘吉尔电》（1940年7月20日），载《战时外交（二）》第116页。

^② 《蒋介石与卡尔谈话记录》（1940年12月12日），载《战时外交（二）》，第59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型飞机转售给中国。^① 对中国方面的其他要求，英方要么以英日尚未开战，要么以英国也已深陷战争，人物皆乏为由，予以婉拒。双方争执最久的是关于军事合作正式实施的时间。中方希望军事合作应以日本攻击云南或新加坡为起点，理由是“如果昆明被敌占领，则中英合作路线必被截断，再无合作可言”。如英空军协防云南，则日军无力再攻新加坡，“而远东之英属（地）乃安全确保矣”。^② 戴尼斯则受其政府训令，坚持合作只能在英日宣战（即日军进攻新加坡之后）才能开始，日军若在此之前攻云南，英国必采取避战态度，“仍守中立”。^③ 由于未形成共识，致多次协商并没有对后来战局的发展产生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就攻占了香港、缅甸及马来亚。

在经济援助方面，抗战开始后法币贬值，已无法维持与英镑的原汇率，英国政府基于与法币的特殊关系，曾一度表示愿资助中国维持法币。1939年3月，英国分别向中国贷款50万镑和500万镑，前者用于购卡车，后者作为维持法币汇率的平准基金贷款。但因当时国民政府外汇储备已近枯竭，财政陷入危机，500万镑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结果，汇率仍是暴跌。蒋介石再向英国要求1000万至1500万镑的外汇基金贷款，无奈英国已陷入欧洲战争，财政上无力资助中国，遂拒绝。1940年12月，美国宣布给中方1亿美元贷款，英国表示愿再贷给中国1000万镑，一半为法币平准基金，一半为信用贷款。蒋介石希望英方将数额增至和美国相等的2000万镑，并强调若不能达到此数，不仅中国军民心理上

① 《卡尔致蒋介石函》（1941年6月10日），载《战时外交（二）》，第158页。

② 《蒋介石致郭泰祺电》（1941年3月25日），载《战时外交（二）》，第151页。

③ 《蒋介石与戴尼斯谈话纪录》（1941年4月14日），载《战时外交（二）》，第155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对英国失望，且于“抗战之影响无益也”。^① 英方则说，英国财力原就无法比美国，又饱受战争摧残，自己尚在向美国“乞怜”，凑足1000万已属不易，万难再增。蒋介石又提出，谅解英方难处，只需英方宣布贷款数，表面上把钱划归中国即可，并非要求立即兑现，甚至“实物之有无与迟早犹在其次也”。^② 为争取英国增加贷款数，蒋介石在重庆、宋子文在美国、郭泰祺在伦敦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均无结果。蒋介石大为不满，甚至向卡尔说，若只借1000万镑，则不如不借，“务请不予发表”。^③ 英国政府不为所动，12月10日正式宣布向中国贷款1000万镑。

太平洋战争前的中英关系中，中国对英国的期望过高，而英国因自身困境，不仅未能满足中国的要求，反而做了有损中国抗战的事，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增加了困难。欧洲战争爆发后，英国希望中国能在远东抗击日军，以缓其压力，中英关系遂渐趋密切，但英国对华的实际援助仍相当有限。

三、欧洲战局对中国战场的影响

中国独自苦撑抗战两年多之后，希特勒统治下的法西斯德国于1939年9月1日悍然入侵波兰，英国、法国向德国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世界局势开始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判断，如果欧洲战事延长，日本必不甘寂寞，会乘机南下，“占领英、法在远东之属地与权益，据为己有”。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关系更加密切，中国战场事实上已与欧洲战场联成了一片。蒋介石对于欧战爆发后英国对远东问题的立场十分关心。

① 《蒋介石致郭泰祺电》（1940年12月10日），载《战时外交（二）》，第231页。

② 《蒋介石致郭泰祺电》（1940年12月10日），载《战时外交（二）》，第231页。

③ 《蒋介石与卡尔谈话纪录》（1940年12月9日），载《战时外交（二）》，第227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他向英国政府探询：“英、法以后对远东与对华、对日之政策，能否固守国联盟约会员国之立场？对于国联所有对华之决议，能否始终履行？并将来英、法与中国对日侵犯英、法在亚洲之一切利益时，英、法希望与中国如何互助合作？”他还明确表示，中国现在即愿意用军事以外的任何办法来帮助身陷欧洲战争的英法两国。^①希望以欧战发生作为中英合作的契机。

欧洲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抗战的目标也有修正。蒋介石在当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说，从前中国的抗战要求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现在欧洲战争爆发，中国战场已成为整个世界战争的组成部分，所追求的目标已变成要和整个世界问题同时解决，中国战场“一定坚持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是真正的解决”。^②

蒋介石关于日本会乘机南侵的判断没错，但对英国反应的预期则过于乐观。事实是，英国为应付欧洲战争，急于避免在远东与日本发生冲突，采取了比以前更软弱的绥靖政策，不仅拒绝了中国支援欧洲战场的善意，而且在日本压力下还封锁了滇缅路，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困难。

1939年9月，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同盟，世界政治格局再次大变。侵略者的结盟促进了反侵略阵营的团结。由于日本与德国结盟，它已成为美英两国的敌对国家，英国首相丘吉尔指出：“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③英美加深了对中国战场重要性的认识，对日本的态度趋向强硬并开始采取切实措施支援中国。在中国方面，虽然德意日结盟使中国增

① 《蒋介石致郭泰祺电》（1939年9月12日），载《战时外交（二）》，第32页。

② 《抗日御侮》，第2卷，第277页。

③ 蒋孟引主编：《英国史》第7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月版。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加了德、意两个强大的敌对国家，可德、意由于各自的处境，投入中国战场帮助日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日本为配合其盟国的战略，无论是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开辟太平洋战场，都势必要从中国抽调兵力。如此，将大大缓解中国战场的压力。而英美为使中国拖住日本军队，必然会对中国政府长期的军事、经济援助要求作出回应。综合以上各点，蒋介石在其日记中不无欣喜地写道，三国同盟的建立，“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定矣”。^①

三国同盟的成立，确为中国抗战外交好转的关键。此后，美英两国对中国的支援大幅增加（当然，距中方实际需要相差仍远），英国重开了滇缅路，美英为反对日本与汪伪政权所订“基本条约”，于1940年12月分别宣布贷款1亿美元和1000万英镑。中国收到了抗战以来最大的一笔经济援助。中美、中英关系朝密切的方向发展。

另一个与中国抗战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是苏联。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战是积极支持的，在中国向英美求助无门的最困难时期，提供过军事、经济援助。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执行社会主义和平外交路线，反对侵略战争；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苏联自知是日本、德国战略上的假想敌，终有一天会遭到攻击。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最担心的是，一旦战争开始后，会受德、日两强从东西两面的夹击。所以他希望通过支持中国的抗日行动，使日本深陷在中国，无力北上进攻苏联。斯大林认为，只有苏联等国大力支援，“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②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都有人说苏联予以中国援助“是为

^① 《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52页。

^② 崔可夫：《在华使命》第35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了苏联的利益才借中国人的手打日本”。^①

苏联虽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对于战争的准备仍在加紧进行。1939年6月间,中苏双方签订了苏联向中国贷款1.5亿美元的协定,并订立了《中苏通商条约》。欧洲战争爆发后,苏联对中国的接济没有减少,“且较前益加增进”。^② 同年底,斯大林派出曾经有过在华工作经验的崔可夫中将担任苏联驻重庆使馆的武官,兼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斯大林当面指示崔可夫,苏联驻华使馆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③ 崔可夫为首的15名苏联军事顾问来华时随身带着一笔不小的军援物资——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500辆汽车,近300门大炮及相应的装备和零配件。

在苏联的战略构想中,主要敌人是纳粹德国。斯大林一面支持中国抗日,另一面也主动与日本改善关系。1941年3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抵达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等人高规格的接待,中国政府极为关注与震惊。4月13日苏日两国签订了《日苏中立协定》,同时双方还发表声明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④ 此一声明显然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中国政府也是一次不小的打击。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东北及外蒙古均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的任何约定,决不承认,苏日之间关

① 崔可夫:《在华使命》第37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② 《蒋介石致斯大林函》(1939年12月1日),载《战时外交(二)》,第336页。

③ 崔可夫:《在华使命》第36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④ 《战时外交(二)》,第391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于东北和外蒙的声明，“对于中国绝对无效”。^① 面对中国的抗议，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向中国大使邵力子保证，苏日协定绝不涉及中国问题，“苏联对中国继续抗战问题，毫不变更”。^②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也以同样的说词来向蒋介石解释。虽然如此，苏日协定的签订对中国军民士气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重庆政界对苏日中立条约的反应起初是极其神经质的”。蒋介石一连几天召开各种会议，显得“不知所措，惶惶不安”。^③ 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唯恐反应过于激烈会得罪苏联，“为敌利用”，故指示对于苏日协定仅由外交部声明对满蒙的主权，其它内容不予置评。

两个月后，德国大举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的爆发为动荡的世界又投进了一个巨大的变数。中国战场牵制日军的战略价值更高了，这增加了中国与各大国交涉的筹码，也为中苏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条件。蒋介石致电斯大林，对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予以声援与支持，表示“我中苏两国友谊深厚，唇齿相依。在今后更应在反抗侵略之同一线……同舟共济”。^④ 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暗示，如果苏联遭到日本攻击，它完全可以得到中国军事力量的支持。中方希望能借机和苏联结成旨在击败日本的军事同盟。另一方面，中国当局又担心苏联被德国打败，德日打通欧亚战场，中国将遭遇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对苏德战场的前景，日本的动向等，都十分关注。

1941年7月1日，德国、意大利相继承认汪精卫政权，国民政

① 《中国外交部声明》(1941年4月14日)，载《战时外交》，第390页。

② 《邵力子致外交部电》(1941年4月15日)，转引自《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486页。

③ 《在华使命》，第101页。

④ 《蒋介石致斯大林电》(1941年7月21日)，转引自《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487页。

府立即发表声明，宣布与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和美、英、苏的关系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中国独自支撑无法彻底战胜日本，国际形势又瞬息万变的大背景下，蒋介石过分依赖外援，消极被动地等待国际局势发生对中国有利的变化。表现在战场上，就是国民党军队不主动地向日军发动积极有效的进攻，而日军在兵力已经相当短缺的情况下，仍能对中国重要城市和野战主力发起攻击，尤其是对重庆的空袭。因此，出现了1940年中国战场上的相对平静和1941年中国军队在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中连遭败绩的结果，以及皖南事变等国共摩擦事件。

第三节 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扫荡大云山，日军再犯湘北

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中日双方在湘北仍隔新墙河对峙，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日军第11军对中国第9战区的战力一直想寻机击破。

1941年春，日本大本营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确定在华日军该年度的作战指导方针是“继续对华实施压力，不容稍懈；尤须利用国际情势，以谋解决中国事变”。要求在该年夏秋之交，“对敌施以重大压力，促使事变解决”。并规定作战“以维持占领地区为主目的，必要时得行短时间的奇袭作战。作战目的达成后，以归还原驻地为原则，不得扩大占领地区”。^① 可见，日军在

^① 《抗日御侮》第2卷，第481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1941年仍希望维持“长期持久”的局面,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或通过时间和地域上有限度的攻击,达成压迫中国屈服的目的。

日军仍将消灭在湘北的第9战区主力视为以有限的兵力实现其战略目的的手段。1941年初,第11军发生人事变动,阿南惟几中将继圆部和一郎中将之后,出任第11军司令官,木下勇少将任军参谋长。他们到任后,发现“参谋部及军司令部的气氛普遍沉闷”。因而希望“积极运用武力击破周围的重庆军”,一方面提高士气,另一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在他们的催促下,第11军的参谋幕僚再次制定在长沙以北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计划。^①

就在第11军紧锣密鼓地准备长沙作战时,6月22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世界局势为之骤变。日本大本营内为是否乘机“北进”或“南进”,一举实现其侵略野心产生了争论,犹豫不决。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一旦苏德战局有利,立即北上攻击苏联。为此,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即“关特演”),从各地抽调大量的兵力和器材,使关东军的兵力剧增为70万人。同时,也不放松对南方(美国)的作战准备。在日本战略目标未定的情况下,第11军的作战计划必然被搁置下来。然而,阿南惟几和木下勇十分热衷于该项计划,私下仍积极准备,还派人向上级主管游说。

经过研究权衡,日本大本营决定静观待机,先不盲动。至8月26日,第11军的作战计划终获批准,但大本营同时附加了两个条件:不得动用准备参加南方作战的部队;作战必须尽快结束。^②

阿南惟几等为制定作战计划,费尽心机,他们反复派飞机侦察湘北周围的地形和中国军队配置,认真参考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

^① 《长沙作战》,第13页。

^② 《长沙作战》,第18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验教训，同时召开各师团参谋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征询意见，进行兵棋演习。最后确定了代号为“加号作战”的作战计划（9月29日改称“长沙作战”）。该计划要旨为，第11军主力于9月中旬从新墙河一线南攻，在汨罗江以南长沙以北地区消灭第9战区主力，10月上旬反转。这次奔袭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沉重打击中国野战军主力，摧毁中方抗战意图，而不是“占领地点”和“取得物资”。^①

8月底，日军先后在湘北集结了第3、第4、第6、第40师团等部队和工兵、炮兵、战车、海军、空军共约10万人。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11军为牵制中方用兵，曾3处开战，结果分散了自己的兵力。接受那次教训，日军将众多的主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以期进行纵深突破”。^②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第9战区仍以保卫长沙为其主要任务。蒋介石在1940年9月指示薛岳：“以后我第9战区作战准备，专注意长沙之一点，其他不必过虑，以免处处设防，处处薄弱，以致备多力分也。”^③战区为完成任务，在沿新墙河南岸从西向东配置了第27集团军（总司令由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兼）所辖欧震第4军、杨汉域第20军、孙渡第58军、韩全朴第72军，其中第4军和第58军各有一部前进到河北岸的大云山（在湖北南部），建立了根据地，破坏敌人后方交通线和通讯设施，不断袭扰敌军。1941年3月，第9战区针对日军可能的进攻制定了“第九战区反击作战计划”。打算套用上次会战的战术，一旦敌军主力从湘北沿粤汉路向长沙进犯，中国军队将“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

① 《长沙作战》，第22页。

② 《长沙作战》，第25页。

③ 《蒋介石致薛岳电》（1940年9月28日），载《作战经过（二）》，第525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而歼灭之”。^① 战区组织兵团参谋旅行及干部演习,以求指挥人员熟悉战地形势,增进战斗技能。从双方战前的作战计划看,大致都与上次相同,选择长沙以北为决战区域。

日军为掩护其主力集中,解除后顾之忧,决心在攻击湘北前先对大云山的中国军队进行扫荡。9月7日,第6师团分别由桃林、忠坊出发,从东、西、北三面围攻大云山。中国部队奋起迎击,日军攻势甚猛,并有空军的火力支援。经两天激战,双方伤亡3000多人,日军占据了大云山区的大部分。但中方仍在坚持,并从新墙河南岸抽调兵力往大云山增援。

10日,日军第40师团从京口到达桃林,与第6师团换防,第6师团无视尚有一部正在甘田与中国军队酣战的事实,只简单地交待说:“已扫清大云山方面之敌,故沙河以北将不会出现大量敌军。”^② 第40师团放松了警觉,不料在甘田附近和中方增援大云山的新编第10师(师长鲁道源)主力遭遇,双方立即展开一场混战。第40师团原定目的地为与新墙河相联的昌水北岸,便不顾阻截,尽力向南冲,沿途常常受到侧袭。12日,薛岳向军事委员会报告:“由忠坊、桃林、西塘出扰之敌,经我军连日痛击,伤亡两千。现敌正处孟城、大云山、石塘场、甘田、白羊田村地区,仍与我新10、新11、第59师各一部及第102师对峙中。”^③ 13日,全力向南推进的第40师团又在白羊田遭到阻击,第11军军部闻讯,急忙派出荒木支队前往援救。中国新编第11师(师长梁得奎)也投入了战斗,在马嘶塅的激战中,中国士兵将敌人压迫在狭窄的山路上,用手榴

① 《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令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长沙作战》,第33页。

③ 《薛岳致蒋介石密电》(1941年9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弹消灭了许多敌人。第 40 师团连遭截击,行动迟缓,到 17 日始完成集结,准备向湘北发动进攻。

日军是为了保证长沙作战的顺利开展,给第 40 师团的南下提供安全保障,才进行大云山扫荡战的,但是由于低估了中方的实力,麻痹轻敌,结果第 40 师团损失较重,其在大云山战斗中的伤亡占整个会战伤亡总数的半数以上。^① 而中国方面对敌方大云山扫荡战的目标判断失误,认为是一次孤立行动,薛岳在日军已开始大云山扫荡战后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判断:“战区当面之敌,除以少数兵力向我扰乱外,似无大企图。”^② 军令部派驻战区的联络参谋张元祜在 14 日给上级的电报中仍说,从日军的态势和部署看,“似无攻略长沙之企图”。^③ 表明出大战在即,中方各种准备均不足。因此没有集中兵力去牵制甚至歼灭第 40 师团,使日军有机会做好了攻击长沙的准备。战后第 9 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检讨说:日军扫荡大云山时,战区始终未予重视,以为是其正常换防前的掩护动作,“及至久经鏖战不退,始疑别有企图”。“判断敌情一般似嫌偏于主观”。^④

二、湘北激战

1941 年 9 月 18 日拂晓,日军配置在新墙河北岸的第 3、第 4、第 6 和第 40 师团的 45 个步兵大队同时向南岸进犯,300 门大炮

① 《长沙作战》,第 36 页。

② 《薛岳致蒋介石密电》(1941 年 9 月 8 日),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 1090 页。

③ 《第二次长沙会战军令部联络参谋张元祜各项报告》,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杨森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检讨与所见所闻敌军之新战法的报告》(1941 年 10 月),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 1106 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齐轰中方阵地。此时正好与前次长沙会战相隔两年。

与日军当面的中国第4军因连日参加或策应大云山战斗，损耗很大，加上对敌人发动大规模全面进攻的准备不足，不敌日军的猛烈炮火，只守了几个小时，即放弃新墙河防线，后撤到第二线阵地。但第4军的新防线当天下午又被突破，无法再事正面抵抗，只能转移到右翼山地待机。日军故伎重演，由海军护卫一部穿越洞庭湖，在位于湘江口的青山强行登陆，以图腰袭、夹击中国守军，策应主力的正面攻势。日军的进攻异常顺利，到19日中午，各师团均已抵达汨罗江北岸各要点，开始强行渡河，速度最快的第6师团已有一部在上午即从长乐街过了汨罗江，占领了南岸的颜家铺、浯口。

19日，军令部确定“长沙为军事、经济要地，应尽量确保”。以此为前提决定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战略方针为：“国军决确保长沙，并乘虚打击消耗敌人之目的，第九战区应先以一部占领汨罗江以北地区，行持久战，并各以有力一部固守汨罗江以南各既设阵地，以于平江附近外翼地区，求敌侧背反包围而击破之。”^①

日军只用两天就完全突破了新墙河防线，攻抵汨罗江北。而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同样的路程却耗用了日军8天时间。薛岳一时惊慌失措，急令傅仲芳第99军、陈沛第37军率主力在汨罗江南岸设防阻击；命令第4军、第20军、第58军在新墙河南岸“衔敌后侧，攻击前进”，以迟滞敌人进军速度；命令第26军军长萧之楚率部推进至金井附近，伺机从东南方侧击南下日军。^② 不幸的是，该

^① 《军令部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军事部署》（1941年9月19日），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084页。

^② 《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报告第二次长沙会战情况文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命令下达时被日军破译。第 11 军针对中方的新部署，决定放弃原定将主力用于湘江方面的作战指导，改为在中方第 26 军的更东侧实行反包围，“于捞刀河北方地区捕捉歼灭敌军”，并令各师团快速向东挺进。^① 此次会战中，第 9 战区使用的无线电码过于简单，屡被敌军破译，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之一。

22 日，战情吃紧，军令部派驻战区的联络参谋张元祜急电重庆，要求第 5、第 6 战区迅速开始总攻，以牵制分散敌人兵力，否则，“兵力悬殊，难以应付”。^②

日军强渡汨罗江后，从 22 日开始分别对中国第 37 军和第 26 军展开围歼。由第 4、第 3 师团围打第 37 军，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向该军主阵地下武昌、狮形山、兴隆山猛攻。经 3 天激战，第 37 军态势逐渐不利，被迫转移。同日，第 6、第 40 师团也围打金井附近的第 26 军。中国士兵虽奋起反击，无奈敌人火力猛，情报准，始终无法逃出被动挨打的境地。25 日夜，日军一部攻下何家坪、五台洞，已威逼第 26 军司令部。第 26 军有全军覆灭之虞。薛岳电令萧之楚，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各个方向都被动防守，要“迅速集结兵力，攻敌一点”，设法向更鼓台、石湾方向突围。^③ 第 26 军经苦战，方杀出重围。

薛岳命第 10 军军长李玉堂增援陷入困境的两个军，22 日第 10 军到达明月山、粟桥、福临铺、金井一线，不料立足未稳，即遭敌军攻击，双方展开了激战。第 10 军措手不及，第 190 师的司令部

^① 《长沙作战》，第 45 页。

^② 《第二次长沙会战军令部联络参谋张元祜各项报告》，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被围，突围时，师长朱嶽重伤，副师长赖侍湘阵亡。^① 全师一片混乱，纷纷向福临铺突围。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也为第3师团所击溃。到26日，第10军终因“伤亡过大”，退出战场。中方的汨罗江防线完全瓦解。

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国民党军队呈涣散之势，贪生怕死，“不战而走者，不在少数”。^② 日军突入汨罗江南岸后即有部队“望风披靡，官长全失掌握，士兵四处溃散，纷纷到平江、浏阳，络绎不绝，甚至团长亦有只身后遁者”。而溃散的逃兵普遍军纪败坏，欺扰百姓，奸掳烧杀，无恶不作。^③ 薛岳为此下令各军、师组织“督战队”，专门负责收容逃跑士兵，“如有不服从收容者，就地枪决”。^④ 但效果极为有限，收容者仅为逃亡官兵的1/10，据杨森战后概算，当时在前线作战的部队，“其实作战未终伤亡者不过十分之一二，溃散逃亡者十分之五六，在战场作战者亦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已”。^⑤ 有的将领视所辖部队为私产，图一己之苟安而不顾整个战局，甚至在战局极度紧张时期，不肯拼命与友军协力，反抛弃任务，不通知上级及友军便率部遁入深山，“将有线、无线通信停止，故意隔绝，致

① 《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第二次长沙会战军令部联络参谋张元祜各项报告》，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杨森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检讨与所见所闻敌军之新战法的报告》，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107页。

④ 《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 《杨森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检讨与所见所闻敌军之新战法的报告》，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107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命令无法下达。事后见敌已退去，始出而电询战况者，大有人在”。^①

汨罗江防线的失利意味着长沙北方门户已洞开，形势严峻。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曾前往衡阳督战，薛岳也在 24 日把战区司令部从长沙撤往湘潭，并部署在捞刀河一线做最后的抵抗。此时，日军所在位置正是第 9 战区预定与敌决战的战场，但由于中方已有数军丧失了战斗力，余者畏敌如虎，避之唯恐不及，根本无力再与之决战了。

在捞刀河两岸阻击日军的是王耀武第 74 军，该军系战区最精锐部队，战前蒋介石指示一定要将该军集中使用，“将来能作策应长沙会战之总预备队”。^② 在战局危急之时，战区不得不提前动用。26 日，第 74 军与直奔长沙的敌军遭遇，试图乘敌人立足未稳，一举将其击溃。一天激战下来，王耀武军损失较重。而日军源源不断地由北向南压下来，有的已经绕至其侧背，形成合围之势。第 74 军只得向南撤退。这样，日军通往长沙的屏障已全部扫清了。

27 日晨，南下速度最快的日军早渊支队在飞机火力的支援下突破中国王甲本第 98 师的阵地，渡过浏阳，开始攻击长沙。下午 6 时许，早渊支队一部自长沙城的东北角冲入市内，刚从前线败退下来的中国士兵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日军开始曾想全部俘获，但因人数太多应接不暇，“不得不在市街北部将其击退，使向湘江方面溃逃”。^③ 当晚，早渊支队占领了长沙。29 日，第 4 师团也开进

^① 《扬森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检讨与所见所闻敌军之新战法的报告》，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 1108 页。

^② 《蒋介石致薛岳电》（1940 年 9 月 28 日），载《作战经过（二）》，第 525 页。

^③ 《长沙作战》，第 78 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长沙，而第3师团为争战功，向军部提出：“长沙已空虚，攻占意义不大，莫如一举挺进株洲，远出捕捉敌之退却部队，并迅速破坏该地军事设施，方为适合之措施。”^① 尚未获得上级批准，第3师团便径自向长沙以南的株洲挺进，29日上午，日军冲入株洲，破坏了军事设施后自行回撤至金潭附近。

中国军队没有能力立即反攻长沙，只是29日由美国支援的陈纳德志愿飞行团派出8架飞机轰炸了长沙。这是“飞虎队”在华第一次实际参战。

到28日，第11军司令部认为已达到击溃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以后的最大目标就是如何巧妙地进行反转”。^② 因此对第3师团攻击株洲的要求也未予批准，并以本下勇的名义下达反转命令，定30日半夜为反转的开始时间（实际上是10月1日开始后撤的）。

在各主战场鏖战之时，第9战区的一些部队利用敌人战线长，护卫供应线路的兵力较少等弱点，曾进行了袭扰战，虽有些斩获，但对整个战局没有多大影响。

军事委员会得知日军退却的消息，立即由军令部命令第9战区“以有力部队分路跟踪追击，相机攻略岳阳，牵制敌人向北转移，使五、六战区作战有利”。^③ 10月3日，对前线实际战况尚不明了的蒋介石接到第4军军长欧震的报告，称正在与撤退之敌激战，“毙敌人马极多”，万分欣喜，批字写道：“此次如不能俘敌至万人以上，则不能算革命军矣。”^④ 中国部队遵命对日军展开追击、阻击，

① 《长沙作战》，第80页。

② 《长沙作战》，第83页。

③ 《军令部第一处致部长、次长签呈》（1941年10月1日24时），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102页。

④ 《欧震致蒋介石电》（1941年10月3日），载《作战经过（二）》，第527页。

取得了部分战果。其中第98军在捞刀河北岸伏击敌军，早渊支队措手不及，伤亡甚重，有两个大队长中弹毙命。原守卫新墙河的几个军，也沿途阻截日军，给敌人制造了许多困难。

湘北日军主力回撤时，中国第6战区部队正在围攻宜昌，城内日军已朝不保夕，固守待援。因此，蒋介石要求第9战区全力迟滞日军退却速度，使其不能回援宜昌。无奈各军已遭严重打击，战力所剩无几，根本无法达成上述目标。第9战区的失利，也导致了第6战区攻宜昌功败垂成。

10月9日，日军第11军各部队陆续撤回新墙河以北，改为守势，中国部队随后追击赶到，双方再次以新墙河为界，隔河对峙。

三、围魏救赵，第6战区攻打宜昌

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中日双方为策应湘北主战场，还在周围地区发生了规模较大的战斗。

在日本方面，第34师团在鄂南赣北第9战区的左翼发动进攻，以牵制中方配置在此的4个军；第35师团在河南进攻郑州，准备以此为据点，“随时向南方攻击，以牵制京汉线南段的中国军”。^① 10月初，第35师团南渡黄河，占领了郑州，但随着湘北战事的结束，又在该月底渡河北返，放弃了郑州。

在中国方面，军事委员会于9月20日向第9、第3、第5和第6战区下达命令：“为使九战区作战容易，第3、6、5战区应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九战区作战。”命令还详细规定了各战区的具体任务；第3、第5战区向当面日军全面游击，相机袭扰日军所占的重要据点，如南昌等；第6战区“对于荆(门)、宜(昌)敌人，应以多数

^① 《长沙作战》，第87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小部积极袭攻，策应九战区作战”。^① 此后，各战区以牵制日军用兵于湘北为目标，开展了一些军事行动。其中尤以第 6 战区所属部队乘敌后方空虚猛攻宜昌，效果最彰。

宜昌位于长江上游，是长江交通的咽喉要地，日军第 11 军在 1940 年 6 月占领了宜昌，希望能够以此“南北分割敌（中国）第五、第六战区，确保攻击敌后方的空军基地，对重庆军从物质和精神双方施加压力”。^② 此后从宜昌起飞的日军飞机不断袭击重庆。宜昌成为中方急欲拔除的眼中钉。

日军主力会攻长沙，宜昌顿显空虚，只留建制不全的第 13 师团守备，周围也只有第 39 师团。9 月 22 日，军事委员会获悉湘北日军攻势甚猛，若非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牵制，情势更危，便指示第 6 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敌人有攻占长沙之企图，第六战区立即攻克宜昌。”^③ 而不是原先所要求的只以小部队加以袭扰。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想以围魏救赵的战术，用猛攻宜昌来吸引湘北日军回援，减轻第 9 战区的压力，甚至一举攻占宜昌，解除心腹之患。而当时在此地区的中国第 6 战区作战兵力多达 12 个军 34 个师，有可能达成以上目标。

陈诚虽决心集中 14 个师攻打宜昌，但惧怕两股日军汇合，希望先打第 39 师团，扫清宜昌周围，再以主力攻宜昌。他瞻前顾后，部署较慢，到 9 月 28 日以后，各部队才陆续开始行动。这时，湘北日军已经准备后撤，攻击宜昌不再具有减轻第 9 战区压力的意义，

① 《军令部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军事部署》（1941 年 9 月 19 日），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 1085 页。

② 《长沙作战》，第 7 页。

③ 《抗日御侮》第 7 卷，第 171 页。据曾任蒋介石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崔可夫称，匪宜昌以救长沙之困，是他向蒋介石建议的。参见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 123～146 页，新华出版社，1980 年 9 月。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反而需要第9战区尽力迟滞日军主力回撤速度，保证第6战区顺利攻打宜昌。到10月2日，第6战区切断了日军第39师团和第13师团的联系，清扫了宜昌外围。同时陈诚也得到了“不顾牺牲务于三日内克复宜昌”的命令。^① 3日，陈诚下令布置各军攻打宜昌的具体作战任务，以李延年第2军所辖张金廷第9师为攻城突击部队，要求该部“于五日晚钻隙渗入宜昌城，夺取宜昌，并将飞机场焚毁破坏”。^② 各部队奋力作战，予敌人很大打击。担任主攻的第9师虽然在6日利用日军防守间隙渗入宜昌东北，不断向城内冲锋，但因日军殊死抵抗，始终无法得手。到9日夜，仍留在宜昌城外。

日军第13师团没有料到会遭受如此大规模的攻击，在四方被围的情况下，顽强作战。兵员不足时，由勤务队、卫生队、轻伤员组成“宜昌防卫队”，投入战斗。师团长内山英太郎在朝不保夕的危局下，已为全军覆没作出了安排，选定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高级军官城破时自杀的地点，作好了烧毁军旗、文件和尸体的准备，并拟好致第11军司令部的最后电报稿，内有“皇国官兵均竭尽军人的天职，高呼大元帅陛下万岁后死去”等语。^③

10月8日，第11军主力北撤基本完成，阿南惟几从岳阳前方指挥所回到武汉，了解到第13师团的险境，“立即决定发起攻势”，除下令第39师团迅速向宜昌增援外，更要求自湘北回撤的各部队向宜昌集结，试图予第6战区主力以打击，战局由此发生逆转。

中国方面知道攻击宜昌的时机正在消失，8日夜，军事委员会

^① 《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报告第二次长沙会战情况文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抗日御侮》第7卷，第182页。

^③ 《长沙作战》，第115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通知陈诚 10 日夜停止攻势，迅速恢复原态势，准备敌人的反攻，但同时对放弃近在眼前的宜昌又心有不甘，电文中有“如在十日前，我军能克复宜昌城，……主力仍应依既定计划完成部署”一语。不久又电陈诚，把停止攻势的期限推迟至 11 日夜，“限于十一日前，尽最大努力猛烈攻击，完成任务为要”。^① 陈诚增加了攻城兵力，为攻下宜昌作最后的冲刺。9 日，各军全面猛攻，其中第 9 师等部在与敌激战一昼夜后，克复了宜昌近郊的胡家大坡、大娘子冈、慈云寺等重要阵地，第 9 师组织的 3 个突击营在强烈炮火掩护下，冲入宜昌城内，占领了东山寺、土城等据点，并曾冲锋到离第 13 师团司令部仅一千米的地方，日军大量施放毒气，配以飞机轰炸，中方突击营伤亡惨重，被迫退出城外。至 10 日，各攻城部队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0 日中午，陈诚命令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再调精锐部队攻城。然而 11 日整天大雨，中国军队的攻势深受限制，而日军增援的早渊支队及第 3、第 4 师团已进至宜昌不远处。第 6 战区奉蒋介石命令停止进攻，利用大雨和阴天摆脱日军的围击，撤回原阵地。

第 6 战区围打宜昌 12 天，歼敌颇多，给日军不小的震撼。但因行动迟缓，致使 14 个师的兵力未能攻下日军一个不完整师团固守的宜昌。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虽中日双方又恢复了战前对峙的阵地，但日军完全掌握着会战主动权，第 11 军在湘北重创第 9 战区主力，攻占长沙，并追击到了株洲。经日军打击，中国第 37、第 10、第 26 军 3 个军被击破，第 4、第 74 军的伤亡也很大，“有两个师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第五十八师，第六十师伤亡也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第

^① 《抗日御侮》第 7 卷，第 189 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一零二师、第五十二师伤亡亦在百分之三十左右”。^① 第9战区事先敌情不明，应对失当，将各军逐个送到敌军主力的正面，被其各个击破。会战结束时，中国方面伤亡及失踪者达7万多人，日军伤亡6 000多人，只是由于日军的主动撤退，才保全了原驻守区域。^② 薛岳自知战败，会战一结束，即致电军事委员会请求处分。电文称会战过程中上级指示周详，将士浴血奋战，“而卒未能收歼敌之功，且贻各将领处置失当之过，此皆职指挥无方所致，职责所在，咎无可辞，拟恳从严议处，以明赏罚为祷”。^③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结果十分明显地反映了战略相持阶段中日双方的实际战略与战力。日军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削减了在华兵力，仅以能防守既占地区为限，可有些前线指挥官却急功冒进，设法挑起战端，尽管他们已不能像抗战初期那样以攻城掠地来建立战功，甚至像长沙这样的重要城市也只能弃而不守，但他们利用有限的战力，选择突击奔袭的战术，企望能一举歼灭中方主力，一劳永逸。在具体战役的策划准备上，细致而又周详，造成局部的绝对优势兵力，突然袭击。中国军队虽经休整，敌人的压力也大为减缓，但畏敌心理依旧，战斗积极性不高，且内部许多固有的弊端又蔓延开来，所以仍吃败仗，常把敌人的主动退却当作“战果”大事张扬。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基本上是不战而弃长沙，日军为宣传起见，破城后“严肃军纪、严禁破坏和掠夺，”未像以往那样大事烧杀破坏，长沙未留下“任何被占领的痕迹”，中国方面

① 陈寿恒等：《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369页。

② 《作战经过（二）》，第528页。

③ 关于会战双方的伤亡数字记载不一。日方说中方死亡及被俘者为58 300人，日方死伤6 854人，见《长沙作战》；中方记载日方伤亡48 372人，己方伤亡失踪总数为70 029人，参见《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中说中方伤亡约59 000人以上，日方伤亡约在40 000人以上。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竟以此宣传日军根本就未占领过长沙，这次长沙会战是“第二次长沙大捷”。令日军在感到“啼笑皆非之外，复生出不少感慨”。^①

四、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

为及时总结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以指导今后作战，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于1941年10月中下旬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对第二次长沙会战进行总评。第9战区的高级将领及相关的军事首长参加会议，蒋介石主持会议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与前两次南岳会议明显不同的是，此次会议召开于中国军队刚受挫于长沙之际，蒋介石十分气恼。他结合国民党军队在会战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对战略战术的确定、将领的指挥、部队的管理及军心士气的低落等均有严厉的批评，对今后的改进方向也指示得相当具体。

蒋介石讲话时强调，中国要想获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最重要的战略方针就是以持久战对抗日本的速决战，以空间换取时间。他说：“我们对敌的方略，就是要争取时间，要持久战斗，使敌人对我们阵地不能随便被他袭击占领，然后我们可以随时捕捉时机来歼灭他！这是我们此次抗战最重要的战略方针。”^② 以空间换时间，并非意味着空间地域不重要，只有较多地占有空间，才能赢得更多的时间，特别是在抗战相持阶段，日军已消耗相当大，对一些重要战略地域往往只能采取突袭攻击的战术，无力进行稍长时间的攻坚战，一遇顽强抵抗，就会撤退。可是，中国的高级将领却畏敌避战，存着保存实力的不健康心态，在所驻守的重要防地不注意构筑坚固的工事，遇有日军来攻，只守上三五天，“就以为是尽了自

① 《长沙作战》，第78页。

②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载《作战经过（一）》，第353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已作战抵抗的责任了，阵地移动后退都不要紧，甚至以为就有词可藉了”，任日军进退自如。蒋介石把这种心态斥骂为“完全是一种卑劣怯懦亡国奴的心理，实在可说是无耻之极”。^① 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在长沙市区内没有核心工事，连城郊附近的复廓工事都没有，日军因此能够轻易攻下长沙，充分说明高级将领仍抱持“陈旧腐败的脑筋”，对现阶段的抗战根本战略缺乏足够认识。蒋介石说：“现在敌人要打我们那一点，他就打我们那一点，他要占领我们长沙，就可占领我们长沙。他要几时来，他要几时撤退，皆可大喊大叫的用广播先通告我们，而且他一定能照他预定的时间，丝毫不爽的实施做到。各位将领：这是何等耻辱的事呀！”^②

蒋介石指示一定要吸取此次长沙失守的教训，在长沙、韶关、衢州、南宁、福州等战略要地构筑坚固工事。修筑工事的要诀是：“由内及外，由小而大。”他解释说：“从今以后，我们要保守一个地方，必须先作好核心工事，只求一团人或一营人所能固守，然后再作一师人的工事，然后再作复廓和外围工事，必须先能稳固核心，而后求其他。这样才是稳扎稳打，也才能歼敌致胜。”^③ 蒋介石还要求在上述长沙等处平常至少也要派一个军的兵力守备，一旦日军来犯，要顽强抵抗，不能再让其轻易得手。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一个重要败因，是中方指挥官作战时未能集中使用兵力，而将总数上占优势的兵力逐渐使用于战场，“犯了逐次推进与陆续消耗之错误”，^④ 致使局部战斗中处于劣势，被敌各个击破。这一方面是兵力部署不当，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指挥官

①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载《作战经过（一）》，第361页。

②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载《作战经过（一）》，第354页。

③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载《作战经过（一）》，第356页。

④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载《作战经过（一）》，第356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胆小畏敌。蒋介石说，此次长沙会战有雄厚的兵力，良好的态势，却被日军轻易击穿而直取长沙，就是因为第9战区未能集中全部兵力，各军师长胆量又小，听到敌人枪声就分兵迎击，结果敌情、地形未弄清楚，兵力已分散用完，等到敌人主力来攻，决战时机形成，手边却已无兵可用，完全陷于被动挨打，以致“敌人来了，不能抵抗，敌人退了，不能追击，几次战斗，毫无俘获”。^①他要求各战区和高级将领在今后的作战中，战略上一定要切实掌握部队，第一线的兵力配备可减少一些，而对日军必攻的重要据点，如长沙、韶关等地，须派重兵把守。战术上各级主管官临战时一定将兵力集中起来，绝不轻易分散使用，要把兵力的使用“看得和自己的生命一样的宝贵”。^②

除了强调构筑工事和集中使用兵力两个攸关战役全局的重要战术之外，蒋介石还针对中国军队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须亟待改进的几个方面：(1)训练组织特种部队，以对付敌人的伞兵及便衣队；(2)阵地上要多筑小据点及防毒设施；(3)封锁小路要隘，严密交通警戒；(4)实行保甲连坐，防止汉奸敌探；(5)研究克制敌军骑兵的办法；(6)整顿射击军纪；(7)注重掷弹练习；(8)多练拼刺刀技术；(9)高级将领应精研典范令；等等。

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特地用一次训话时间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畏敌怕死，争权夺利，骄奢淫逸大加谴责。他说，几年来日军已渐趋疲惫衰弱，而中国士兵的装备、数量及质量均有进步，然而中方却仍吃败仗，证明中国军队实在太无用，太怯懦，而部队没有战斗力的根源就在于高级军官的腐败。蒋介石重提两年前他在第二次南岳会议上的训词，称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升得太快。

①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载《作战经过（一）》，第374页。

②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载《作战经过（一）》，第359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其精神修养与学问能力，“实在不配担当现在这样高级的职务和阶级”。然而，他们却无自知之明，一旦“有了势力与地位，就目中无人，矜骄自满，以为什么人都不能教训我，甚至正言不入于耳，过失无从自知”，对上欺瞒敷衍，对下持职傲物，不学习，不研究，不求上进，平时不严格训练部队，战时畏敌如虎，更有甚者，腐败堕落，赌博，利用经济封锁走私谋利，前方军官竟随军携带家眷等等，造成军心涣散，士气不振，打起仗来必败无疑，“自误误国”。^① 蒋介石责问与会的将领：“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虏敌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的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也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现在敌人反而俘虏了我们的士兵，常常穿了我军制服，混入我们的阵地，我们作战于我们国土之内，还不能照样拿到敌军的俘虏吗？”^② 他同时罗列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不良现象，如病兵、逃兵增加，虐待新兵，伤兵无妥善救护办法，后方留守人员招摇不法，泄露军情，自我标榜，毁谤友军等等，严加批评，责令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们要接受教训，彻底觉悟，彻底反省，“以后必须改弦更张，以期及时补救”。^③

会议结束时，对第二次长沙大战各部队依表现进行赏罚，对第79军首先渡河进攻长沙的两个团等单位及第57师指挥李翰卿等死亡官兵予以奖赏。第58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经军法审判，予以枪决。

^①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载《作战经过（一）》，第379页。

^②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载《作战经过（一）》，第378页。

^③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载《作战经过（一）》，第380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当时的宣传机器为激励士气正大肆颂扬“第二次长沙大捷”。然而，严酷的战争结果使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不能不面对现实，在会上较客观地评价会战成败，提出“现在长沙虽然得以保全，但并不能算我们打了胜仗，我们不但没有任何虚荣，而且要引以为耻辱”！^① 并以此认识为基点，结合会战过程对国民党军队的积弊，从战略战术的运用，高级将领的怯懦无能，到军队内部存在的管理训练问题都有较深刻全面的反省。针对日军消耗已大，持续攻击力不强，作战求速战速决的弱点，蒋介石制定了一套以对重点地域的顽强防守与集中使用战场兵力相配合的“磁铁战”，作为今后一切战略的最高原则。所谓“磁铁战”，就是在敌人进攻战略要地时，我军必须顽强抵抗，像磁铁一样紧紧吸引敌人，使其欲进不得，欲退不能，造成有利于我军的时机，然后倾注全部的主力与预备队，围歼敌人。^② 这一战略原则，较符合相持阶段中国军队粉碎日本速决战的实际情况。

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刚结束，蒋介石又下手令，指示对国民党军队的“素质、训练、补充、编制、装备各种事项，必须有一彻底研讨与改革”，提出未来防御的重点，重庆以外，“第一要点为昆明，第二要点为西安”，特别强调对云南的防守，要能应付日军 6 个师团的攻击，昆明市区要构筑可供两个师使用的工事，限于 11 月底完成。^③

尽管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确定的战略战术，大多停留在会

①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三）》，载《作战经过（一）》，第 397 页。

②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三）》，载《作战经过（一）》，第 384 页。

③ 《蒋介石指示湘北战后须研讨改革国军事项及对西南作战部署手令》（1941 年 10 月 26 日），载《作战经过（一）》，第 397 页。

议文件上，“磁铁战”也没有在日后的正面战场上普遍采行，国民党军队内的腐败现象更是愈演愈烈，然而，蒋介石的痛骂重责毕竟尚有震慑作用，第9战区在对长沙市区的防御兵力配置和工事修筑上不敢再掉以轻心，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第四节 枣宜会战

一、日军谋犯宜昌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欧洲大陆爆发战争，日本军方既感到兴奋，同时也很苦闷。美法与德国之间开始进入战争状态，便无暇顾及远东，从而为日军实行南进政策提供了难得的良机，急躁的日本军阀面对富庶的英、法、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跃跃欲试，亟想染指其间，但由于中日战争迟迟不能结束，日本军方担心丧失南进的机会。因此，日本军方企图在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寻求迅速解决中日战争的途径，但对如何着手则意见分歧。日军大本营力图削减在华兵力，节省兵力准备世界大战，甚至设想以从华中、华南撤兵为条件，谋求与蒋介石政府妥协，从而结束中日战争，从泥潭深陷的中国大陆脱身。中国派遣军则力持异议，认为不彻底打垮中国军队主力，便无法使中国政府屈服，因而应趁国际视线集中于欧洲战争的大好机会，积极策划新的作战。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1939年11月14日提出《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力主打击国民党军主力，占领战略要点并加以固守，他提出了3个方案，一是攻打长沙、衡阳；二是占领宜昌；三是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打通京汉线与华北日军取得联络。^①这就要求日军大本营改变消极保守占领区的战略,企图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打破中日战争的相持状态。1939年12月初开始,中国发动了“冬季攻势”,这是中日战争以来中国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攻势,第11军遭到第5、第9战区中国军队的全面攻击,伤亡甚重。侵华日军深感在中国军队战力尚存、士气尚盛之际,依靠外交或诱降等谋略手段是不能奏效的,试图进行一次大反击作战以进行报复。1939年12月中旬,第11军正式提出攻占宜昌的方案,并得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吉西尾寿造的赞成,他要求东京方面予以批准,并增派两个师团协助作战。该计划起初未得到谋求削减在华兵力的日军大本营的首肯,随着欧洲方面德国军事行动的节节推展,日军大本营好像注入了一剂兴奋剂。4月10日,东京批准了宜昌的作战计划。

4月中旬,日军开始将鄂东麻城,赣北奉新、靖安等据点放弃,并抽调湘北的第6师团及赣北第40师团各一部,连同原驻湖北的第3、第13、第39师团,陆续向钟祥、随县、信阳等要地集结。第11军预定整个作战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作战以枣阳为中心,计划在汉水东岸的枣阳周围构成数道包围圈,消灭第5战区主力,以便解除进攻宜昌的后顾之忧和侧面威胁,然后转入第二期作战,在汉水两岸进行两翼包围,将汉水两岸的中国军队消灭在宜昌附近,并占领宜昌。

中国方面在4月初便觉察日军兵舰在长江下游上海至汉口间往返频繁,第5战区正面日军显著增加。为此,第5战区于4月13日、14日召开各集团军总司令会议,商讨对策。战区判断,日军若进窥宜昌、沙市,似将主力由襄花路方面攻击,企图歼灭襄河以东地区野战军,解除侧面威胁。第5战区决定将襄河以东第5战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第112页

区主力配置于襄花路以北地区,作战指导方针为:“战区以一部取正面分路挺进敌后方,积极施行扰袭,主力适宜控置于后方,相机以先发制敌行动,于枣阳以东荆(门)、当(阳)以南地区,与敌决战。”^① 第5战区决定,由江防军司令郭忏指挥第26、第75、第94军、第128师等10个师及第6、第7游击纵队,利用襄河东岸、荆河右岸阵地,巩固大洪山南侧各隘路,主力配置于长寿店以北地区,阻敌北犯,以黄琪翔为总司令的中央集团军,辖有第11集团军(欠第39军)、第45军、第127师等6个师及第1游击纵队,负责随枣地区的正面防务和桐柏山、大洪山的游击战;以孙连仲为左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2集团军6个师及鄂东游击队等,负责迎战信阳方向的日军。机动兵团由汤恩伯任总司令,下辖第31集团军11个师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担任侧击西犯日军的任务,预备兵团为第22集团军,由孙震指挥,辖第41军3个师;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李品仙指挥第21集团军5个师及游击队,从事对沿江日军据点和平汉路南段的游击战。

二、襄东地区的包围与反包围

5月1日,日军由信阳、随县、钟祥3个地区发动进攻,而信阳、随县的日军又各分两路推进,形成日军5路合围进攻的严峻局面。信阳日军为第3师团和第40师团,主力从游河、长台关一线发动攻势,企图经明港转向泌阳、唐河,第3师团石本支队则沿桐柏—西新集大道前进,准备抢占枣阳以北地区。随县方面的日军为第39师团及第6师团的一个旅团,主力由随县正面攻枣阳,一部北攻吴家培。钟祥日军为第13师团,由钟祥北进,直指双沟集、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电》(1940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张家集一线地区。日军基本沿袭随枣会战时的两翼包抄、分进合击的战术,对唐河、北河一带构成外层包围圈,同时在樊城、枣阳之间构成内层包围圈,以求捕捉第5战区主力加以消灭。第5战区则准备以一部兵力固守桐柏山、大洪山,随枣路方面军队则一面抵抗,一面遂次转至唐河流域,战区主力部队则采取迅速向左右两翼外侧移动的步骤,争取外线主力地位,退至唐河、新野之线以北、以西及汉水西部地区。

在左集团军方面,第3师团由信阳向北进攻,5月1日占领了明港、狮子桥。同日,日军一部占领了信阳西北的小林店,然后向西及西北突进,5日占领了泌阳和桐柏,7日占领了唐河,并南向攻击枣阳。

在右集团军方面,5月1日,日军第13师团在战车20余辆,飞机十余架的掩护下发动进攻,右集团军主力撤至长寿店。3日,力图阻敌北进的右集团军未阻止日军攻势,丢失了大洪山西麓的长寿店。在攻占丰乐河、汪家店后,6日,日军进攻在田家集、黄龙垱以西的第33集团军,第41军第122师奉命前往流水沟、田家集支援,该师装备很差,新兵较多,未能稳住阵脚。7日,流水沟、田家集陷落,第33集团军退守襄东岸,日军第13师团便长驱北上,得以和由唐河西进的第3师团取得联系。

在随县的中央集团军方面,日军第39师团及第6师团一个旅团为等待左右两翼完成包围,直至4日才向第11集团军发动攻势。5日,随县西北的高城、安居等阵地先后被日军攻占,第84军等守环潭、唐县及高城以北之线,以第174师守备唐县,主力撤至枣阳附近阵地。因沿汉水北进的日军向枣阳的方向突进,中央集团军侧背受敌,枣阳至襄阳公路被日军切断,第173师陷入多面受围的困境,遂决定放弃唐县、枣阳,日军逐次攻占随阳店、吴家店,8日从北、东、东南及西面进入枣阳。中央集团军主力向唐河、白河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西岸转移，在日军战车及快速部队追击下，损失甚重。第173师在唐县掩护第84军主力从枣阳撤退，后在太平镇一带与日军遭遇，该师损失过半，师长钟毅不幸阵亡。

10日，日军第3、第39、第13师团等三路会合于枣阳以西的唐河白河畔，占领了襄东地区，以为包围行动大功告成，孰知此时中国军队主力已快速突出日军包围圈，除第29集团军、第45军陈鼎勋部及鄂豫边区挺进军王仲廉部分别局促于汉水以东的大兴山、桐柏山外，其余均退至汉水、唐白河西岸及新野泌阳唐河一带整顿。从内线转成外线，日军10天攻势，结果是扑了一场空。相反，中国军队机敏地对日军进行反包围，将日军左、右翼向中央地区压迫，将其大部分兵力包围于襄东平原地区。

10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5战区：“鄂北之敌经我多日围攻，粮弹殆尽，必将向原阵地退却。第5战区应乘敌态势不利退却困难之好机，以全力围攻捕捉。”^① 同日，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首先率5个师东渡汉水，横断随、枣公路，堵住了日军南退和西进的去路。第31集团军与第2集团军第10个师从北面新野、唐河一线迅速南下，围困住了第3师团。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彻底击败日军，从防守宜昌的江防军中抽调第75军、第94军等主力北上参加围攻，汉水西岸的第39、第53军也西进加入反攻。

日军于5月8日已决定结束襄东战事，但被第5战区反攻部队咬住后，一时进退两难。第13、第39师团向南撤退，第3师团被中国军队孤立包围，后路被切断，粮食弹药都已告尽，但为牵制住中国军队主力，苦守不退。5月10日，日军鉴于退路被堵，决定围攻进抵黄龙垱、方家集的张自忠部，第13、第39师团等部围攻第33集团军，双方拼死对战，“张自忠部在黄龙垱、据家湾、浴山一

^① 《枣宜会战文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带毙敌七八百名”。^① 枣阳方面，中国军队仍在围攻第3师团。14日，攻占枣阳北面的湖阳镇，第68军攻占长台关，第3师团被迫向枣阳以南收缩。此时，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五战区应以遮断敌退路，断其补给为主眼，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围歼枣阳一带敌之主力。”^② 张自忠将军接奉命令，以必死的决心致书第33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表示：“因战区全面战事关系及本身责任，须过河与敌一拼。如不能与各师取得联络，即向最终之目标（死）迈进。毋论作好作坏，一求良心能得安慰，以后事情弟负责。由现在起，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16日，张自忠亲率第74师主力及特务营从宜城渡河，驰往大洪山北麓沟园地区南瓜店，孤军深入日军后方，日军第39师团主力两路围攻，张自忠将军及所率部队陷入重围，张自忠率残部奋勇作战，左肩、胸部均中弹，为防落入敌手，遂拔枪自杀，壮烈殉国，所率特务营等也伤亡殆尽。第33集团军遭此打击，攻势顿挫。日军左侧威胁得以解除。日军主力于17日再度转兵北进，与第3师团协力反攻中国围攻部队，当时中国部队十余师迫近枣阳周围，第一线部队近者距离仅一公里，远者也只有四五公里。^③ 19日拂晓，日军各兵团全线总攻，第5战区各部被迫从枣阳一带分别向新野及汉水、白河西岸转移。日军反击大获成功，但第39师团在白河渡河作战中遇到一个严重挫折，21日，第233联队于零时左右抢渡白河时，遭到埋伏的中国军队的突然扫射，转瞬之间就将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以下300余人击毙在毫无遮拦的河中沙洲上。^④

^① 《第二、五战区战况通报》（1940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枣宜会战经过及其检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3页。

^④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3页。

在襄东地区战斗中,中日双方展开了包围与反包围的激战,日军在付出死伤3850人的代价后,才勉强完成了第一期作战任务。中方阵亡3万余人,其中包括张自忠、钟毅两位高级将领。张自忠将军战死实为中国方面一重大损失。他在临沂一战挫败日军锐气,为台儿庄大捷之先声;徐州会战结束时,担负后卫,掩护大军安然撤退。其后参加武汉会战、春季攻势、随枣会战、冬季攻势均有卓越战绩。像他这样彻底将身心乃至生命献给神圣抗战的高级将官在国民党军队中是罕见的,不愧为抗战军人之魂。

三、宜昌攻防战

5月21日,日军命令各部主力在唐河以南地区集结,准备以后作战。第40师团接任平汉铁路及襄东守备,第3、第39、第13师团在枣阳及钟祥地区稍事休整。此时,在第11司令部内,对是否按原计划实施第二期作战发生争论,由于第一期作战中,日军遭到了预料之外的打击,已感疲惫,从第11军新任司令官圆部和一郎以下将领,多数对实施新的作战感到犹豫不决,直至23日深夜才决定继续作战。25日,第11军下达了准备从汉水渡河的命令,要求第3师团应于5月31日半夜从襄阳东南方奇袭渡过汉水并攻占襄阳,第39师团同时从王家集一带奇袭过汉水,配合第3师团作战。^① 担负运输任务的第13师团等则在其后完成了在钟祥南方沙洋地区的集结任务。

5月31日晚,日军第39、第3师团先后渡过汉水,进攻襄樊。军事委员会令第41军死守襄樊,以等待第30军增援。^② 第41军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册第2分册,第15~16页。

^② 《军事委员会会议记录》(1940年6月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战力脆弱,当日军渡过时,河防守军误将日军渡河使用的马达牵引的橡皮船当成水陆两用坦克,军心恐慌,河防崩溃。第3师团于6月1日攻占了襄阳。第5战区长官部所在的老河口及南阳陷于危急,第5战区判断日军将继续西进,立即组织新的防线,令第75军由吕堰驿南下驰援樊城,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火速由枣阳向襄阳推进。第30军池峰城部赶至老河口待命。2日,军事委员会令第41军反攻襄阳,同时将第5战区划分为左右两个兵团,左兵团辖孙连仲第2集团军、孙震第22集团军、汤恩伯第31集团军、刘汝明第68军等各部;右兵团辖冯治安第33集团军、王缵绪第29集团军、郭忏江防军及由第9战区增援的部队,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兼任兵团长。

日军第3、第39师团分沿襄阳、南漳、遂安道及宜城、荆门、当阳道转而南下,平行而进,目标指向宜昌,主力从襄阳至唐河一线突然全部撤退,3日攻陷南漳、宜城。第41军、第77军尾随日军,3日收复襄阳,4日占领南漳。此际,战局重心移至荆门、当阳地区,此种情形实出第5战区意料之外。6月4日夜,第13师团等日军南路军复从旧口、沙洋附近强渡襄河,分向沙市、江陵、十里铺一带西进,企图与北路的第3、第39师团会合后,围攻汉水西岸中国军队于宜昌以东地区。

宜昌是武汉和重庆间最大和最重要的内河港口,为进入四川的咽喉,其西即为地势异常险要的三峡,因而宜昌实为战时首都重庆的门户,并且是沟通大江南北第1、第3、第5、第9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由于荆门、当阳方面的战况瞬息万变,第5战区已难以指挥。为了适应局势,确保宜昌,军事委员会决定重划战区,长江两岸划为第6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任副司令长官,该战区北与第5战区,南与第9战区相为犄角。

6月1日,陈诚离开重庆,4日抵宜昌,负责重组战线保卫宜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昌。防守宜、沙的主力原为江防军，但襄东地区战事紧急时，江防军主力第75、第94军北上增援，江防已形空虚。江防军在荆、当预设立阵地筑有纵深防御阵地，仅都是正面朝东，没有构筑对北的阵地，由于日军意外地从襄阳南下直扑荆、当，但南路日军从汉宜公路正面展开攻势，致使江防军正侧两面同时遭受巨大压力，处于慌乱状态，第26军萧之楚部放弃汉水西岸一线阵地，退守沙市、后港、建阳驿、拾回桥第二线阵地。由湘、黔调来的第2军李延年部赶赴当阳一线布防。第9战区增援部队第20集团军、第53军、第73军则在长江南岸策应宜、沙防卫战。陈诚得到重庆方面的准许，将彭善第18军由重庆运输到宜昌，他所指挥部队的后勤补给改由重庆方面直接负责补给。

第5战区协助陈诚所部作战，第75军、第30军从樊城跟踪日军南下，汤恩伯率第13、第29、第85、第92军由襄阳附近渡河，沿襄阳公路向南前进，增援荆、当地区。而第33集团军因主将张自忠阵亡，且侧背受敌，防线已乱，纷纷向荆门西北山区撤退，当阳一线阵地完全暴露。6日，经短暂交火，第26军放弃了荆门、沙市、十里铺、拾回桥等重要地区。9日，日军北路率陆空联合进攻第2军在当阳东北观音寺一带布防阵地，新33师张世希部一触即溃，第2军主力退归当阳，日军跟踪追击，9日占领当阳，前来增援的第75、第30军只得在当阳北侧与日军对峙，汤恩伯部则在荆门以北与日军交战。10日，日军第11军下达攻占宜昌命令：“军决定攻占敌军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江南北联络要冲宜昌。”^① 11日拂晓，日军向宜昌城郊第18军阵地展开全面攻击，展开了两天殊死的攻防战，双方伤亡甚重。12日，宜昌失陷，第18军等退至宜昌以西阵地。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8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日军虽占领了宜昌，但对是否长期占领宜昌却拿不定主张。6月12日夜，日第11军下令准备撤离宜昌，并以一周为限，毁掉宜昌市区的各种军事设施。15日，圆部和一郎司令官正式下令撤离宜昌。第18军发现日军退却，迅速跟进，17日先头部队进入宜昌。谁知日军大本营因德国打败了法国而激起疯狂的热情，16日晚电令第11军确保宜昌，结果撤退日军又突然回师，双方展开激战，至24日，日军才完全恢复对宜昌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作为决策错乱的代价，日军回师后死伤近300人，而且宜昌在日军撤退前已作了大破坏，重返宜昌的日军连可以住的营房都没有。

日军占领宜昌后，将主力集结于当阳与汉水附近地区，中国军队则在江陵、宜昌、当阳、钟祥、随县、信阳以北之线，对日军保持侧击之势，历时近两个月的枣宜会战至此方告结束。

枣宜会战中，日军造成中国军队死伤56 000人的重大损失，还占领了战略要点宜昌，对重庆构成一定威胁。日军在宜昌修建飞机场，对四川大后方等地狂轰滥炸。枣宜会战后，中国方面还丢失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第5战区不得不以贫瘠的鄂北山区为后方根据地。日军在枣宜会战中死伤约两万人左右，为了确保宜昌，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增派第4师团从东北到武汉地区增援。

宜昌失守后的1940年夏、秋之季，对中国政府而言是8年抗战中最感到困难和动摇的时刻。欧洲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等人抱有过分乐观的看法，但德军在欧洲战争中节节胜利，就在宜昌失守的6月12日，法国首都巴黎被德军占领，英国军队虽度过敦刻尔克危机，但只能困守英伦三岛，美国则仍主中立政策，国际法西斯侵略阵营的气焰十分嚣张。蒋介石等国民政府上层人士原指望欧战发生后能得到英、美、法等的直接援助。但英、法在战争中一败再败，不仅无力援助中国，而且还在远东谋求与日本妥协。1940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年4月，英、法、美大使就曾劝告蒋介石早对日媾和，蒋介石当时表示，如果日本不撤兵就不可能谈和。6月23日，法国在日本压力下宣布封锁滇越路。7月18日，英国也为讨好日本，宣布封锁滇缅路4个月，封闭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苏联忙于准备应付欧洲局势，有意与日本改善关系，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有所削减。不仅国际局势中的暗云密布令国民政府上层人士悲观失望，国内政局和战事的演变也使他们严重丧失抗战到底的信心。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蒋介石等对日军战争能力估计过低，及至冬季攻势失利，枣宜会战受挫，已意识到日军力量仍居优势地位，宜昌一失，重庆已有唇亡齿寒之感，加上日军大本营从5月2日起下达了对中国内地重要战略目标特别是重庆实施空中攻击的命令，5月中旬，由日本陆军和海军航空兵联合进行，作战时间为3个月，日本空军对重庆、成都等城市狂轰滥炸，屠杀了大量无辜平民，市民们忍受了难以诉说的苦难，但国民政府中的某些人已准备与日本中途妥协。随着国共摩擦日益显著，国民党以及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越来越感到恐惧，想方设法限制中共力量的发展，对日妥协的空气亦十分浓厚。蒋介石利用司徒雷登与日方联系，1940年3月至7月间，并派宋士杰、陈超霖、章友三等与日方的铃木卓尔、今井武夫、臼井茂树等在澳门、香港等处多次秘密谈判。对此，日本方面有如下评述：“在这昭和15年（1940年）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时间内，的确出现了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所以如此，应该说在八年的日中战争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严重的，实际上是在宜昌失守的时候。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①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55页。

第五节 正面战场上的拉锯战

一、豫南会战

豫南地区是指陇海线以南黄泛区以西的河南广大地区，它东连皖北，西靠秦陇，南接鄂北，平汉铁路纵贯其间，公路交通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0年6月枣宜会战结束后，日军在鄂北豫南侵占了宜昌、当阳、钟祥、随县、信阳等据点及该线以南地区，负责守卫该区域重要据点的是日军第11军下辖第13、第39、第4、第3、第40等师团。中国军队则在此线以北以西地区利用伏牛山、桐柏山的屏蔽，伏有重兵。在此区的东部，中日军队沿黄泛区对峙着。同时，中方还在大别山麓驻有主力，对豫南鄂北之敌的侧后翼形成威胁。驻守在豫南及周边地区的中国军队自北向南分属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共驻有15个军约36个师。

枣宜会战之后，日军日益感到周围中国军队对宜昌、信阳等据点及平汉线的巨大威胁，分兵把守，则不免分散兵力，捉襟见肘，陷于被动。因此，日军决定倾力攻击平汉线两侧的中国第5战区部队，试图在双方的主力决战中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彻底解除中方的威胁。1941年1月，日军开始集中第11军的第3师团、第40师团主力及第4师团一部，并从驻守京沪的第13军抽调第17师团主力及第10师团一部，和大量火炮、骑兵、战车、空军，集中于豫南应山、信阳、罗山一线，统一由第1军司令官圆部和一郎中将指挥，准备攻击中国军队。

日军将攻击豫南的部队分为3路，其配置如下：左路——第3

师团、第4师团的一个联队及战车队,由第3师团长丰岛指挥,沿小林店、泌阳、商水、舞阳一线从南向北进攻;中路——第17师团主力,附加一个联队和战车队,由第17师团长平林指挥,自明港出发,沿平汉线北攻;右路——第40师团主力,由该师团长天谷率领,从正阳、槐角镇先强渡淮河,再沿野猪岭、汝南、上蔡线向北攻,3路大军在空军掩护下以平汉线为中轴,由南向北平行推进,而以左路为主力。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根据以往的经验,预料日军迟早会在豫南及附近地区发动旨在围歼中方野战主力的进攻,并判断日军可能以奔袭的战术寻求双方主力决战。军事委员会战前曾指示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一旦日军来攻,要避免与对方形成决战局面,使其企图落空。具体部署是,第5战区应“以一部于正面行持久抵抗,牵制敌之主力,一部向敌后截断其交通,主力由外翼侧击而击灭之”。^① 李宗仁遵命在平汉线正面配置了一个师与敌保持接触,主力则留在离铁路较远的两侧,保持机动,伺机向日军两翼及后背攻击。

为转移中国军队的注意力,配合豫南主战场的攻势,日军先在东西两侧发起佯攻,1月20日中午,日军驻守当阳的第18混成旅团,驻江陵的第39师团,驻钟祥的第4师团一部首先在鄂北襄河两岸向与其对峙的中国第29集团军、第33集团军进攻,以牵制该方面的中国军队;在豫东皖北方面,日军第21师团一部由宿县向西攻击蒙城、涡阳,第4骑兵团由亳县西攻鹿邑、涡阳;在北方,驻开封的日军也派兵南下通许、朱仙镇,企图策应豫南日军的行动。

面对日军在襄河两岸的进攻和在豫南的大量集结的情况,蒋介石1月25日致电防守豫南的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示

① 《抗日御侮》,第6册,第44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作战要旨：“敌军必于下月初或本月底向弟所属各部进攻，务希严令各部积极准备，不可为敌所制，此次敌之攻势，其范围必较远大，豫东南之商城、阜阳、郾城，豫西之南阳、临汝，皆为其预定之目标，近则舞阳、汜阳、桐柏、确山、正阳自为其必窜之途，希以此敌之意图，速作对策，限于本月底布置完妥，总以避免与敌正面决战，而以少数兵力在正面节节抵抗，引其深入，以主力在敌各进路之翼，作主动的侧击；另以有力一部埋伏敌后，等其前进以后，专事切断其交通。”^① 从电文可以看出，大战之际，蒋介石对敌方的攻击目标及方向仍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只含糊地认为“其范围必大”，然而，“避免与敌正面决战”的作战方针是确定不疑的，保存实力是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战略指导思想。

1月25日晨，豫南日军分左、中、右3路在空军配合下同时发起进攻；豫南会战正式打响，中方第一线部队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下辖刘汝明第68军遵上级命令，并不死拼硬守，只用少数部队与敌正面接触，阻滞日军前进速度，主力则与敌保持距离。3路日军均未受到大规模的阻击，行动颇为顺利，26日，分别到达泌阳、高邑、邢店、确山一线。27日，又抵达龙王庙、沙河店，驻马店、汝南一线。

这时，中方统帅部才大致弄清了日方所投入的兵力及主攻方向，判断敌人总兵力约在一个师团以上，“似无大规模企图”。因此，决定不再一味避战，指示各军集结队伍，“待敌窜至汝南、驻马店附近之线”，各部队应积极将敌围击，务期于淮河以北、遂平间地区歼灭之。^② 中国军队开始部署向日军两翼出击，第31集团军

^① 《蒋介石致汤恩伯电》（1941年1月25日），载《作战经过（二）》，第492页。

^②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报告》（1941年1月28日），载《作战经过（二）》，第494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下辖的张轸第 13 军由舞阳南下象河关附近；李楚瀛第 85 军由临泉东进，向上蔡附近机动；已被日军冲散的第 68 军重新集结，尾随左路日军之后；第 33 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统辖的曹福林第 55 军自南阳东移，向陇海线左侧的黄河靠近；黄维纳第 59 军主力则从樊城北上南阳，填补第 55 军留下的空白。

由于这一积极围击敌人的部署同原先避免与日本决战的命令完全相反，加之此时日军已突破至统帅部拟定的决战区域遂平附近，各军将领不知所措，行动迟疑观望，伺机歼敌的计划无法实现。

29 日起，重新部署的中国各军开始与北进的左右两路日军遭遇，第 13 军在舞阳以南的接官厅、小史店附近地区同左路日军第 3 师团发生较大规模的战斗，“日军伤亡三千余人，战车被毁六辆”；^① 第 85 军则在汝南附近，侧击左路日军第 40 师团。中路日军未遇正规抵抗，顺利抵达遂平。

日军正因中方避战无法形成双方的主力决战而犯愁，两军的战斗接触，使其感到有机可趁，圆部和一郎于 1 月 31 日改变了三路大军平行北进的配置，把中路一分为二支援两翼：第 17 师团主力向左迂回，迅速占领舞阳，企图切断中国军队北边的退路，与担任左路的第 3 师团南北夹击中国第 13 军；另一部分则向右旋转，从遂平向上蔡一带攻击，企图与第 40 师团夹击中国第 85 军。

中方侦知日军企图，立即恢复避战态势，第 13 军和第 85 军迅速与日军脱离接触，在敌人的包围圈形成以前，先后逸出。左右两路日军于 2 月 2 日分别占领舞阳和上蔡，但围歼中国主力部队的企图再度落空。

日军长途奔袭，连连扑空，侧翼和后方补给线又受到袭扰与威胁，士气不振，此时，中国军队再次集结，第 29 军（军长陈大庆）、第

^① 《军令部呈豫南战况》（1941 年 2 月 4 日），载《作战经过（二）》，第 498 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59军、第60军分别从泌阳、唐河及以北地区袭击左路日军。在右路,第84军(军长莫树杰)于1月29日攻克日军背后的正阳。日军指挥官判断战场形势渐趋不利,主动权正在丧失,便决定向南退却,在后撤过程中再相机打击中国军队。2月2日,两路日军在分别清扫舞阳、上蔡地区之后同时返转。

担任豫南会战主力的左路日军在撤退时兵分两路,第3师团经方城攻击南阳。2月4日,再由南阳向东南攻击唐河;第17师团则从舞阳直下象河关,企图对集结在泌阳、唐河地区的中方第29军、第68军、第55军实行围攻。但是第3师团在南阳附近遭到中国第59军的阻击,双方“激战两昼夜,敌我伤亡均大”。^①第17师团也在象河关附近先后与中方第68军、第29军发生激战。日军无法围歼中国军队,反而有被反包围之虞,便放弃战前的计划,迅速沿唐(河)泌(阳)大道和桐(柏)信(阳)大道撤回,2月27日,抵达信阳。相比之下,右路的日军第40师团的返转较为顺利,从上蔡经汝南至信阳,一路未遇截击。

中国军队尾随日军之后,将敌人回撤时放弃的城镇一一收复,至2月7日,豫南主战场完全恢复了战前的态势,豫南会战结束。

皖北日军第21师团为策应豫南作战,一度东进连陷三堵集、太和、界首数城,豫南日军返转后,第21师团也随即退回原驻防地。

豫南会战中,中日双方仅有小规模的遭遇战,伤亡损失均不严重,加之会战时间只有十来天,很快就恢复了原先的态势,所以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会战过程中,日方以歼灭中国野战主力为目的,积极进攻,且随战局变化而变更部署,支战场与主战场配合策应也算及时。然而,长途奔袭却无功而返对其士气是有一定负面影响的。

^① 《军令部呈豫南战况》(1941年2月4日),载《作战经过(二)》,第498页。

影响的。中国方面，确定避免主力决战的作战方针实有其不得已之处，各部队能迅速与日军脱离接触，使敌人接连扑空，但是，由于战前对日军企图及部署不明，甚至畏惧，形成整个会战过程中，一味避战，以至在一些局部占很大优势的时候，不敢主动反攻，任日军进退自如。这是保存实力的消极战略指导思想和将士畏敌情绪的必然结果。会战一结束，蒋介石就指示军令部长徐永昌：“检讨此次豫南作战经过，敌我优劣各点之比较，以及以后我军作战应改正与注意之点。”^①

二、上高战役

豫南战役中，中国守军汤恩伯丢城失地，更加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时隔一月，日军又在赣北发动所谓“鄱阳扫荡战”，企图攻略高安、上高，摧毁赣江、抚河两条流域间的中国军队，直捣江西心脏，以消耗中国的反攻力量。

防守赣北的第9战区第19集团军罗卓英部，采取诱击战术，在以上高为重心的赣江两岸地区发起上高会战，予敌重创，挫败了日军扫荡赣江两岸物资的大规模“鄱阳扫荡战”计划。这次战役，改变了中国军队对日军队“历次会战兵力六比一之惯例”，^② 打破了日军“攻必克”的妄念，推迟了日军调往华北的时间，被视为正面战场上“空前战捷”。^③

高安、上高两城，位于赣西北，居群山环绕之间，扼制赣江、锦河水面交通，地形险要，成为反攻南浔的前沿阵地，也是樟树、吉安

① 《蒋介石致徐永昌手令》（1941年2月9日），载《作战经过（二）》第499页。

② 赵曾倩：《抗战纪实》，第3册，第89页，商务印书馆发行。

③ 《蒋介石致熊斌卫立煌电稿》（1944年3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98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的外围堡垒。

日军自 1939 年 3 月下旬占领南昌后，中日双方为争夺南昌及外围据点曾经多次交锋，高安阵地一度失而复得，日军被迫据守靖安、武宁一线，与中国赣北守军对峙，豫南战役前后，赣北的中国守军奉命不断对日军进行侧袭，使敌惊恐不安。为了巩固南昌外围的据点，保证占领区安全，华中日军决定打击赣北方面第 9 战区部队，夺取战略要地上高。

赣北战场中国守军分区设防，赣东防区：自南昌东南（赣江东岸）至鄱阳湖东岸属第 3 战区第 32 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赣北防区：自赣江西岸，由西山方面起，经高安、奉新、安义、靖安，由第 9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 19 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赣西防区：自靖安以西，武宁至鄂南通山，由第 30 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

1941 年春，据守南昌、安义、箬溪等地的日军，着手西犯准备，加紧补充兵员。日军原驻守赣北兵力约 5 万人，计有第 33、第 34 两师团及独立第 14 混成旅团。其中第 33 师团驻南昌东南至永修间南浔铁路沿线，第 34 师团驻安义、武宁及其附近公路线，独立第 14 混成旅团驻南浔北段九江方面。1941 年 2 月中旬，驻守长江下游的日军独立第 20 混成旅团及第 3 飞行团，奉命抽调至赣北，分别集结于牛行、望城岗地区及南昌机场。3 月初，日军主动放弃武宁县县城据点，以集中兵力，缩短防线。为了掩护西犯企图，迷惑中国守军耳目，日军行声东击西故伎。一方面佯装东攻临川、鹰潭，一方面故作玄虚，征集民夫修筑道路，将赣江东岸部队向连塘、上坦店等地移动。飞机、地面战车，也佯作东犯姿态。

日军虎视上高，是中国守军意料之中的事。早在 1940 年 5 月，第 9 战区制定的反击南昌作战计划中规定：“敌如进犯高安、上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高、万载，则诱之于分宜、上高、宜丰以东地区，反击而歼灭之。”^①据此，赣北防区第19集团军决定由东向西部署三道阵线。第一阵地线：由瑞洪（不含）沿抚河右岸，经锦河南岸至塘里一线。第二阵地线：自青岚湖西岸的罗岭起，跨赣江西岸至锦河北岸泗溪至九仙汤一线。敌军进犯时，逐次抵抗，等到敌军进入第三阵线，再集中兵力围歼之。

按照上述计划，罗卓英命令第70军李觉部（辖唐伯寅第19师，宋英仲第107师，张言传预9师）为左翼诱击兵团，利用第一、第二两阵地有利地形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后，适时转移，插入敌后侧背，截断日军后方。右翼，由划属罗卓英指挥的第3战区第49军刘多荃部（辖王克俊第26师、王铁汉第105师、曾夏初预5师）从赣江东岸秘密出击，与左翼友军配合，对敌施行外线反包围。正面以第74军王耀武部（辖李天霞第51师、余程万等57师、廖龄奇第58师）为决战兵团。待左翼部队将日军诱吸到第三阵地线时，协同各兵团，将其合击歼灭。^②

1941年3月14日，日军利用夜间分三路秘密转移集结。北路，第33师团14000余人，集结于干洲街附近；中路，第34师团除一部留守原阵地外，主力约2万人，集结于西山、万寿宫附近；南路，第20独立混成旅团8000余人，集结于厚天街附近。日军的战役企图是分路合击上高，然后东渡赣江，窜扰樟树、丰城。“扫荡”赣江两岸物资，攻击中国第19集团军正面，巩固南昌外围，实

^① 《第九战区反击作战计划》，《上高会战军委会与各战区司令军事情报文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十九集团军总部机密作战日记》（1944年1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现“鄱阳扫荡战”的目的。^①

3月15日晨，北路日军第33师团在樱井指挥下，自安义城北宋埠、西干洲两地向中国第70军正面进犯。一股约千余人，另一股约万余人，两股日军成钳形向西伸展，包抄奉新。驻守奉新的70军第19师在城西设防阻击，预备第9师留守城东迎敌。日军凭藉空军和重炮掩护，急速向奉新外围阵地推进。预9师第26团一部奋起迎击，力阻敌锋。因敌军炮火猛烈，众寡悬殊，被迫放弃外围阵地，撤向奉新城内。是日晨，奉新城外日军兵临城下，攻至秦新东南方向洪田的敌人，利用重炮侧击奉新，日军正面炮兵也向奉新城猛射，盘旋于奉新城上空的9架敌机滥肆轰炸，旋即，奉新失守。日军占领奉新后，很快越过潦河，一部向退守凤凰山至五步城一线预9师攻击，一部向19师阵地肺头赵进犯，主力则向西突进，预9师五步城一线阻敌失利，又北撤到米峰，石子陵一线与敌相持。此时，第19师与预9师阵地隔潦河相望，千余日军利用暮色由潦水南岸第19师与预9师结合部间隙钻入车坪、棺材山一带。预9师第26团虽与敌激战一夜，由于第19师未能配合夹击，使日军乘隙西进。16日拂晓，敌进入水口甘附近。与此同时，进犯第19师第57团巴茅山阵地的日军，遭到该团猛烈还击，经过一昼夜激战，17日晨，敌军向东退缩，但是，北路日军主力已进至铁夫岭、樟树岭。同时，由宋埠进至赤田张的敌人也连夜西犯，与敌军相持的我米峰、石子陵阵地遭到8架敌机大肆轰炸，预9师指挥部人员因避空袭，猝不及防。日军已窜至伍桥河，逼近预9师师部所在地。由于连遭日军攻击，预9师伤亡颇重，被迫西撤至潦水上游罗坊附近整理。

① 第19集团军参谋处编：《上高会战概述》，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第 19 集团军司令部根据敌已分股进到南山河、村前街及高安城北的火陵上附近的形势,对部署及时作了调整:“令任诱敌作战之 70 军作离心退却,陷敌分离后对敌反击,并由抚河东岸抽调第 49 军第 26 师王克俊部兼程西进,集中樟树以侧击敌人。”18 日,第 70 军奉命撤入第三阵地线的下观童、花门楼待命。19 日晨,第 19 集团军命第 2 挺进纵队配合第 19 师主力向东出击,迂回到敌后骤拢袭击北路日军。敌 33 师团由于孤军深入,虽突破中方第一、第二阵地线,但出动仅数日,已伤亡 2 500 余人,加之合击上高的计划未得到南路及时配合,退路面临我 70 军切断的危险,不得已于 19 日沿潦河向安义退却。^①

南路日军池田指挥的独立第 20 混成旅团兵力约 8 000 余人。5 月 15 日晨,自赣江北岸牛行出发,企图与北路以“两臂合抱之态势先捕捉我军主力于高安、上高间地区而歼灭之。”^② 日军利用夜幕,两次偷渡锦河,遭到驻守河口夏的第 70 军第 107 师宋英仲部的阻击。16 日晨,敌凭藉炮兵、飞机的掩护,再次强渡锦河得逞,第 107 师退却至仙姑岭一线,此时,第 74 军第 51 师李天霞部一团兵力奉命调往独城附近,增援 107 师。由于我军增援及时,使南路进犯日军在红石岭山地一带“遗尸 400 余具”。^③

南路日军派出的赣江支队 18 日窜至泉港街、姜家渡等地,他们的任务是为沿赣江南犯,攻占清江、樟树、丰城后作渡河准备,以接应主力攻占上高后渡江东犯。

① 《蒋介石致熊斌卫立煌密电》(1941 年 3 月 30 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 979 页。

② 第 19 集团军参谋处:《上高会战概述》(1941 年 5 月 15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③ 第 19 集团军参谋处:《上高会战概述》(1941 年 5 月 15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次日晨，敌赣江支队派出 200 余人的先头部队偷渡赣江东岸，企图进犯樟树镇，适逢中方右翼王克俊师由赣江东岸抽调西进，乘敌半渡予以迎头痛击，残敌仓惶落水，退守江心沙滩，由泉港开拔的敌增援船只，也被击沉，余敌向曲江方面退去。同日，由坂本率领的赣江支队主力经兰家桥、张家山企图窜过陈家坊急袭清江县城，截断中方赣江两岸联络。王克俊师第 76 团由樟树上游迅速渡过赣江，乘敌立足未稳，在张家山、崇祯观附近予敌以歼灭性打击，仅崇祯观一带消灭敌人 40 多人，缴获军马 30 多匹，使樟树、清江免遭日军践踏。王克俊师被当地民众誉为“神兵”。^①

中路敌军为大贺指挥的第 34 师团，兵力约两万人。在北南路敌军发动的次日即 16 日拂晓开始行动，以高安为目标，沿湘赣公路西犯，企图与南北两路合力从两翼包围中国第 74 军。

中路日军先以战车 20 辆冲到我 70 军第 107 师左翼阵地小岭、祥符观一带。然后分兵转攻 107 师赵家山、莲花山阵地。激战至中午，赵家山、莲花山阵地相继失守，高安城顿失屏障。日军凭借飞机、战车掩护，攻击高安城北的火陵上附近。第 107 师右翼主力退守高安，面对强敌，形势严峻。是守是撤，守城官兵产生动摇。17 日夜，第 107 师锦北岸高安附近的部队先脱离战场，接着第 107 师主力自动放弃高安，并违令在高安至灰埠间的沿河部署警戒，使敌步骑兵 400 余人得隙渡河南犯，第 107 师仓惶突围，各级指挥失控，队伍陷于紊乱，撤退途中，又屡遭敌阻截，伤亡颇重，余部退往田南圩。

中路日军占领高安后，乘势西进突破中国军队阵地线前沿阵地龙团圩，并逼近第三阵地线前沿。其时我两翼诱击兵团正在牵

^① 第 19 集团军参谋处：《上高会战概述》（1941 年 5 月 15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制日军，未及抽兵对敌施行反包围。第 74 军如不采取果断灵活战术，主动出击，扰敌待援，必将孤军决战，不仅上高不保，也不能完成协同各兵团合击歼灭敌军计划。

18 日上午，日军进至龙团圩后，第 74 军军长王耀武即将第三阵地线的前沿阵地推进至龙团圩附近的龙王岭、扬公圩、黄峰岭一线，与敌成对峙态势。同时命令第 57 师进入坎头岭至下曹港一线，第 58 师进入桥头至黄家浦一线以加强警戒。为了摸清敌情，第 74 军利用夜间派出搜索部队，分途施行威力搜索，在龙团圩西南，搜索部队一部与敌展开了遭遇战。接着千余日军向扬公圩前沿阵地扑来，受到第 57 师补充团的阻击，敌虽一再增援，但直至 19 日中午，始终未能突破我前线阵地。当日下午，敌 34 师团一部在 9 架飞机和重炮的掩护下，经石塘、姜田圩进犯官桥街，第 58 师以一团拼死力拒，鏖战至黄昏，双方伤亡惨重。此时，敌 34 师团主力援兵万余人赶到并对中方前沿阵地实施反包围。我军见势不利，为完成合击歼敌计划，撤退至上高东北泗水西部阵地与敌对峙。

第 74 军在正面利用既设阵地，顽强抵抗，争取了时间，为两翼兵团适时转移，插入敌军后方，施行外线反包围，起了重要作用。

19 日，我左翼诱击兵团预 9 师向仙姑坛、丁家山一线出击，第 19 师唐伯寅所部主力东进抵湾里湖至许江许一线，压迫北路残敌。右翼第 26 师王克俊部则绕袭敌侧右翼，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也奉命派出钟石磬第 3 挺进纵队所属的 3 个保安团，向奉新、高安一带截击回犯的日军。第 9 战区电令各军“积极对敌猛攻，务将深入捣乱之敌，歼灭于高安锦河南北地区”。^① 同时抽调西北第 72 军

^① 《薛长官致罗总司令指示作战机宜皓电》(1941 年 4 月 19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陈良基新 14 师,付翼新 15 师西进增援。

日军分进合击上高企图遭受严重挫折后,又面临着被局部围歼,各个击破的厄运。为了挽救败局,日军企图通过反击调整兵力部署,使南北两路日军向中路日军主力靠拢,以集中兵力夺取上高。

3月 20 日,南路日军池田独立第 20 混成旅团一部,向锦河南岸中国第 51 师鸡公岭一线主阵地发动反攻,遭到守军顽强抵抗。守军利用迫击炮火掩护,与日军展开肉博,血战竟日,歼敌 200 多人。我军百余人以身殉国。^① 旋即,池田所部五六百人利用飞机、大炮掩护,再次向鸡公岭阵地猛攻,炮击 500 余发,一营守军大部伤亡,敌乘机蜂拥而上,营长率一连兵力机警地绕敌侧背发动奇袭,消灭日军 300 多人,阵地失而复得,迫使残敌退至猪头山一线。两小时后,日军池田旅团的 3 个独立大队联合反扑,势在必夺第 51 师主阵地线。中国守军拼死抗拒,勇猛杀敌,经过两天激战,共歼敌达千余名。南路日军余部虽达到与中路主力日军汇合的目的,但反击锐气遭我挫伤,分进合击的左臂被斩断。这就为中国军队从两翼对中路敌军达成包围创造了条件。

中路第 34 师团,是日军进犯上高的主力。自 19 日逼近第 74 军正面前线阵地后,气焰尤其嚣张,在南昌发了题为“上高陷落在目前”的“大师报号外”^②。与敌对峙的第三阵地线只有第 50 师、第 58 师两师兵力。该部李天霞第 51 师已奉命作机动,深入日军侧翼,因此阵地防守单薄(每营守备约 7 公里)。为了确保上高,第 19 集团军一方面命唐伯寅第 19 师,抽调一加强团,挺进高安,扰乱敌后,一方面自两翼抽兵以加强第 74 军主战场,同时命第 74 军

^① 第 19 集团军司令部:《上高会战战斗详报》(1941 年 3 月 15 日至 1941 年 4 月 9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赵曾传:《抗战纪实》,第 3 册,第 109 页,商务印书馆发行。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余廖两师以守为攻，拖住日军，实行围歼。第74军为缩小正面战线，对日军施行包围，将核心阵地移至下破桥一带。

20日，日军集中10余门大炮，30余架飞机集中袭击泗水西岸我74军塘坎、港西罗地区，廖师一部奋力阻击，激战至夜，我塘坎附近阵地被敌突破。21日，廖师转至白茅山、樟树、下荷舍一线与57师潘家桥、云头山阵地成斜交阵地。余廖两师，经过一天激战，打退了日军三次进攻，日军夺取斜交阵地终未得逞。

22日晨，中路日军集中近万兵力，凭藉20多架飞机掩护，向第74军阵地猛攻。守军“拼死力拒，虽然血肉纷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全线敌我伤亡均在4千以上”。^①为增援第74军，赢得时间，集团军司令部将特务营派往前沿阵地参战。

日军困兽犹斗，23日，日军师团长大贺坐镇毕家指挥，集中34师团主力约6000余人，进犯聂家、下破桥、徐楼一线核心阵地，意在必得上高。由于守军炮火猛烈，使敌未能得逞。俄顷，日军又以10余架飞机对我阵地低空轰炸，以掩护步兵夺取我方阵地。守军奋勇抗击，往返冲杀，下破桥核心阵地失而复得三次。日军虽受重创，仍倾全力反复攻击，我守军官兵死伤枕藉，仍奋力固守。24日晨，我守军又夺回了一度被日军占领的白茅山阵地。同日中午，日军孤注一掷，与我争夺下破桥、白茅山阵地。大贺团长亲自督阵，将南路池田残部3000余兵力也拼凑其间。日军出动的70架飞机，反复狂炸我下破桥，白茅山阵地，投弹多至1700余枚，阵地大部被炸毁，我军伤亡惨重，情况十分危急。关键时刻，第74军预备队先后7次与敌肉博，毙敌2000余人。第74军将士舍身拼杀，为实施我两翼对敌包围，赢得了宝贵时间。同日，我两翼部队第

^① 第19集团军参谋处：《上高战役概述》（1941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70军、第72军、第49军部进入预定战位，完成了南北直径10华里、东西30华里椭圆形包围圈。

日军见陷入我重围，急电汉口日军司令部求援。24日午，援敌一路2000余人，自九江南驰。另一路是第33师团第215联队从奉新开出西犯伍桥河，分向棠浦、官桥急行。

中路日军妄图利用救援伺机突围。25日晨，日军首先选择我左翼部队预9师阵地坑口冷、介子坡、南蔡罗一线为突破口，发动了猛烈进攻，预9师官兵奋力抵抗，激战至中午，双方伤亡均重。此时日军援军已迫近棠浦、官桥，预9师因顾虑遭受日军前后夹击，擅自决定东撤，向第19师阵地凉子脑、桐子坑阵地靠拢。适逢日军猛犯第19师阵地，混乱之中，第70军副军长张言传错误决定放弃既设阵地，令第19师、预9师分向北凤凰圩、庄坊附近撤退。此举，使包围圈扯开了一大缺口，敌援军第215联队得以直入官桥与第34师团主力会合，给围歼增加了困难。

26日，集团军又重新调整兵力部署，由预9师、第19师于官桥附近堵击日军，防敌突围与增援，分令第74军57师余程万一部经潘家桥向北进击，第58师廖龄奇部，第71军第107师宋英仲部向官桥进击；第49军第105师王克俊部于官桥以东攻敌侧背；第72军新15师付翼部向江家洲以南，新14师陈良基部经棠浦转向东南，迅速聚歼敌人。^①与此同时，第74军从正面开始向东全线出击，由于雨雾朦朦，敌机无法施展威力，为我重施紧缩包围提供了条件，同日午夜，日军已被包围在以官桥为中心南北直径不满5公里包围圈内。

27日拂晓，第74军分途挺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第57师克

^① 《上高会战军委会与各战区司令军事情报文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复泗溪。中午第 58 师几经血战后克复傲古山、炉下、河段一线。下午,第 74 军第一线官兵又冒着日军投掷的大量毒瓦斯弹,收复毕家(原第 34 师团指挥所所在地)。此时距官桥仅 4 里,正在前进之际,自动后撤的第 107 师忽报白茅山发现敌人,第 50 师考虑到左翼完全暴露,不得不停止前进,回师防范。实质上,正是担任实施左翼包围的第 107 师作战不力,延误了攻取官桥的计划。原来 27 日晨,敌人发现再次被围后,倾全力从第 107 师防守薄弱环节离谢楼附近突围,由于第 107 师一部与协同作战的新 15 师发生冲突,引起混乱。日军则乘乱对离谢楼突然猛攻。中国军队仓猝应战,混战至天明,伤亡惨重。敌骑兵 500 多人直冲到西源里新 15 师指挥所,顿时中国军队陷于混乱状态。日军千余人由此突入水口圩,南袭第 107 师左侧,第 107 师仅以一部防守堵击,主力自动撤退,造成我左翼完全暴露。东进之第 58 师掉头回防,攻取官桥计划又成泡影,而日军一部得以突围东遁。

28 日,集团军司令部饬令各部以官桥街、南茶罗为目标,猛烈进攻,彻底围歼残敌。当日我主力进迫官桥,日军被迫退守官桥市内。经过一日巷战,官桥街全部被收复。日军遗尸累累,第 34 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被击毙。

与此同时,第 105 师王克俊部在杨公圩南北高地对突围东遁之敌进行截击,自湘赣经高安赶来增援的千余日军,也被我军阻击于龙团圩附近。

29 日午,战区司令部又令第 49 军军长刘多荃率领 4 个师的兵力组成右追击军,沿湘赣公路,经高安,向牛行追击;第 70 军军长李觉率 3 个师兵力组成左追击军,沿伍桥河、奉新道向安义追击。

30 日,中方第 26 师、第 105 师、预 9 师、第 19 师在龙团圩、杨公圩围歼日军两千多人,接着按追击部署向高安、奉新方向追击。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31 日晨，陷入敌手半月之久的高安城被我克复，日军东遁归路被截断。

4月1日晨，日军以15架飞机掩护突围，向斜桥方向逃窜。中方在追击中，沿途收复了陷于敌手的城镇据点。4月2日，中国军队除恢复战前原态势外，并攻占西山万寿宫。4月8日、9日，又克安义外围的长埠、宋埠、干洲、弓尖各要点。上高战役始告结束。上高战役中国军队伤毙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以下15000余人，军马2800余匹，击落飞机1架，俘虏日军百余，缴山炮、迫击炮10门，及步枪千余支。^①这在国民党抗战史中“殆可谓难能者矣”，不仅国内各地开会庆祝，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重视。美国各大报纸“多以显著地位揭载赣北日军大败新闻”。英国特派驻华大使馆武官史丹尼少将“前来参观战绩”。^②

上高战役，中日双方兵力大略相等，中国武器装备远不及日军，但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操之于中方，该战役指挥适当应为取胜主要原因。蒋介石曾亲自总结上高战役作战教训，“转饬所属遵照，并师长以上皆须阅读研究”。^③可事隔月余，与上高战役态势相近的中条山战役，中国军队却惨遭败绩。

三、中条山战役

1941年5月，华北日军以约10余万兵力，发动了对晋南中条山的围攻。曾声称要“坚持山西，确保河防”的卫立煌部近18万人，面对日军进攻，“一经中间突破，各部皆陷于包围零乱之中竟至

^① 《上高会战经过与检讨》（1941年4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抗战纪实》，第3册，第92页。

^③ 《蒋介石致熊斌卫立煌等密电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982页。

不可收拾”。^①结果，日军以近 1 比 20 的极小伤亡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给晋南抗战带来严重的困难，成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②

太原沦陷后不久，日军继而占领了晋南长治。中国军队为了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分散在晋南山地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游击根据地。

中条山位于豫北晋南交界处，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瞰制豫北、晋西，屏蔽洛阳、潼关，是便于向华北进击的要地。^③驻晋豫两省的中国军队分由第 1 战区卫立煌、第 2 战区阎锡山统辖，由朱德率领的第 18 集团军，也编入第 2 战区战斗序列。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二三年内，日军不仅向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对中条山地区也发动了 10 多次围攻，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肃清黄河北岸的中国军队，扫清南犯西进的障碍。由于中国军队的抗击和配合，日军始终未能得逞。驻守中条山地区的第 1 战区卫立煌部近 18 万人，与环绕中条山外围 4 个师团日军成对峙状态。

1940 年，由八路军在华北发起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原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剿灭”占领区内共产党的日军，在选定山西境内 1941 年度打击目标时，则改变了主意，他们认为八路军在进行了百团大战以后，战斗力恢复得很慢，而卫立煌部在中条山地区则以众多兵力，长期牵制着日军 4 个师团，山西境内的阎锡山部队又无意与卫立煌军队合作，战斗力也低，因此决定首

① 《蒋介石对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1941 年 5 月 28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蒋介石对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1941 年 5 月 28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 108 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先击破晋南中国军队后，再全力对付八路军。

据此，日军进行了部署和战前准备。环绕中条山外围与卫立煌部对峙的，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筱冢率领的第25、第36、第37、第41师团，分布于豫北的沁阳、博爱及晋南的晋城、沁水、绛县、闻喜、夏县、安邑一线。为了加强进犯中条山的力量，中国派遣军先后从华中、苏北抽调第33、第21师团配属第1军。日军大本营于4月19日从关东军调来飞行第32、第83战队，第3飞行集团主力（轻轰6个中队，侦察3个中队，直协两个中队，战斗1个中队）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担任空中配合^①。

日军的部署是：参战的日军主力置于张马—垣曲一线，将战场分成东西两个地区，作战重点放在西部地区。从全部42个大队中集结了35个大队。正面，利用黄河障碍和既设阵地，以挺进部队从两侧地区楔入，切断中国军队退路，施行包围。接着以迅速的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中国军队完全围歼。为了使包围得逞，日军部署了双重包围，并编成了精悍的挺进队，专事抢占黄河北岸的重要地点，截断其退路。在“胜败在于八分准备”^②的口号下，日军一方面进行适应作战地区、地形战况的训练，另一方面利用准备性作战，击退了晋东陵川一带的中国军队27军和翼城以南、绛县以东与主力脱离的中国第15军。这样，就为向中条山的进犯造成了有利态势。

与日军积极准备、严密部署相反，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由于执行“反共”、“限共”政策，名为中条山游击根据地，但驻守的军队对日本并不主动出击，以致黄河北岸各“渡口生死攸关桥头堡，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33页。

②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1941年10月2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025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毫不注重，而且未闻有何工事”^①。“中条山地区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3年，而并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②更没按战时需要储备给养，参战区域“物资极度贫乏，根本不能辅助军事”。^③

1941年4月，日军开始向中条山周围地区集结。4月18日，何应钦在洛阳召开黄河沿线第1、第2、第5战区军以上长官军事会议，研究中条山地带作战计划，各战区在汇报中充分暴露了在日军大举侵犯面前疏于防守的状况。有的提出，守备兵力不足，有的强调，当地粮食不能自给，还有的提出重兵器不足，等等。更有甚者，不顾大敌当前，还纠缠讨论如何瓦解共产党问题，致使长达四个半小时的会议未能拿出任何作战方案。直到4月20日，第二次“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检讨会”上，何应钦才提出对中条山地区作战指示和注意事项。

国民政府对于晋南三角地带作战，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计划。何应钦指出，为了确保中条山，第一步应相机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以恢复1940年4月前的态势；第二步与晋西军及第2、第8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的敌人；最低限度亦须确保中条山。但是，中国军队处于内线，疏于防守，背水列阵，千里馈粮，士无斗志，谈何确保？

4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有由济源、模皋大道会犯垣曲的企图，作出了加强阵地工事，破坏阻塞主阵地前道路，打破敌之攻势的先敌出击的计划。然而，这一出击计划在下达

^① 《蒋介石对于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陈述意见》（1941年5月～7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1941年10月28日），第1战区中条山会战要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924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各战区过程中,因中间指挥系统繁杂,迟延费时,加之卫立煌尚在返洛阳途中,各阵地中国守军对敌“如常时而毫无万分之一之准备”^①,直至5月5日,所策定的出击部署仍未全部实施,而日军已于5月7日下午以钳形与中央突破的方式,由东、北、西三个方面发起了进攻。中日双方兵力部署如下:豫北(道清西段)日军第35师团一部,第21师团一部,骑兵第4旅一部,共1个半师团,计25 000余人;中国军队为第9军裴昌会部及丁树本部,共约4个师3万余人。晋南(阳城、绛县、闻喜、夏县、平陆一带)日军主力第33师团一部,第41师团一部,独立第9混成旅,第36师团,独立第3混成旅团,第24师团,共计5个师团计7万余人;中国军队为第93军刘戡部,第98军武力敏部、毕梅轩纵队,第15军刘茂恩部,第43军赵世钤部,第74军一部,第17军高桂滋部,第85军李楚瀛部的94师,第3军曾万钟部,第80军乔明礼部。总计敌军约7个师团,计10万余人,中国军队19师1个旅3个游击纵队,兵力约十五六万人。^②

7日下午,道清西段之敌分三股向我济源、孟县进犯,分段防守济源地区的第2战区第9军郭寄峤部并未加强阵地工事构筑,见日军来势凶猛,于8日中午自动放弃济、孟两地,西撤至封门口既设阵地。封门口为日军西进之要道隘口,敌增兵猛攻,自9日上午激战至10日晨,封门口被日军攻破,第9军第42师一部及第47师由狂口南渡。12日晨,分路进攻的日军在邵源附近会合。当日,日军占领并封锁了黄河沿岸各渡口。由于我第9军“并未坚强

^① 《蒋介石对于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1941年5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陈述意见》(1941年5月~7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抵抗，全军自由后退未加制止，使敌得以迅速合围，影响 14 集团军作战甚大，狂口渡亦早落敌手，豫北退路全被闭锁”。^①

晋南方面，日军第 33 师团附独 4 旅团一部，自 7 日起分经阳城、沁翼大道向董封东西线南犯；第 41 师主力，附独立第 9 旅团由绛县向横皋大道南犯；第 36 师团经沁水、侯马、闻喜、堰掌方面向东南犯；第 37 师团附独 3 旅团一部及伪军第 24 师，分由夏县、张茅大道东犯，重点指向横皋大道及夏县方面。日军分编多数纵队，成广正面钻隙迂回，将重兵分置于各要点，构筑工事，封锁山口、渡口，逐步紧缩包围，并利用汉奸，快速小部队袭截我通信联络及各指挥部。由于中方“未能于会战前反内线成外线，致受敌之围攻，到处被其突破，始终陷于被动”。^②

会战开始第二日，“情况剧变，敌之来势极猛，致一日间师以上多数司令部为敌阻击，致指挥部通信时有中断”。^③ 董封东西一线，我 98 军官兵经多日顽强抵抗，由于敌增援反攻，激战至 13 日，董封失陷，守军第 98 军、第 15 军撤退至横河镇东西地区。

沿横皋大道南犯的日军约两万多人，矛头直指黄河最重要的渡口垣曲。在此设防的中国第 43 军赵世钤部历来战斗力低劣，一经日军中间突破，纷纷后退。8 日黄昏，垣曲失陷，此时，中条山的国民党军队已被敌军截为东西两部，通讯断绝，失去联络。

9 日、10 日，日军自垣曲分股向东西方向挺进，分别包围刘茂恩、曾万钟集团军。由于狂口渡早落敌手，豫北退路全被闭锁。

① 《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陈述意见》（1941 年 5 月～7 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陈述意见》（1941 年 5 月～7 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1941 年 10 月 28 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 1026 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刘、曾集团军背水困战，整个战局十分危急。而战区长官司令部“并无重大处置，任各军各自为战”。10日，曾万钟全军陷于重围。战区虽命令其向北转移，但因当时“通讯工具全毁，与各部已失联络，命令无法下达”。^①此时，日军从四面进逼，曾万钟决定以团为单位向西北突围。至13日，只有第3军、第17军各4个团突破敌包围，向汾河西岸转移。11日，刘茂恩直接向重庆蒋介石发电，一方面电告战斗失利情况，一方面求援，电文中称：“狂口补给线已被截断，潦山内瘠，苦又无屯粮，大军已绝食3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枵腹血战，状至可悯，若不急筹办法，恐有溃散之虞。”^②原来“中条山地区未有按作战要求屯粮，应需给养只输送至黄河各渡口为止，各军不得不抽派三分之一以上的战斗兵力不断往返搬取，以应每日需要。因此部队战斗力减低，且战斗开始即告断炊，致因饿而致死者甚多”。^③刘茂恩本“拟率军主力向沁、翼以北扩展，并于阳城以南酌余一部，以期就食”。^④不料行至沁河附近，遭日军截击尾追，激战竟日，敌我伤亡均重。卫立煌考虑“该部迁延时日太大，北上殊多危险，留置现地游击，给养困难，将士疲劳”，遂电令刘茂恩即率主力“分期分组南渡”。^⑤

晋南闻喜、夏县东南的日军第36师团主力、第37师团及独立

① 《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陈述意见》（1941年5月～7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陈述意见》（1941年5月～7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陈述意见》（1941年5月～7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刘茂恩与蒋介石来往密电》（1941年5月1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005页。

⑤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1941年10月2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015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第 16 旅团各一部,于 7 日下午向张店镇以东第 80 军、第 3 军的结合部猛攻,激战数小时,守军阵地被突破。8 日下午,第 80 军、第 3 军撤至四交河亘望原一线。9 日午夜,由于日军攻势猛烈,宋军被迫退至台砦村附近。激战中,我新编第 27 师损失较重,师长王峻、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权均壮烈殉国。10 日晚,余部奉命陆续南渡。

日军自 11 日起进行南北篦梳扫荡。12 日,东进日军在邵源与西进日军会合。我各军主力于 13 日开始突围,几经艰苦周折,至 20 日,第 93、第 19 两军分别突围到达稷山、乡宁,第 98 军的两师到达沁水以北地区。其余部队被冲散,有的被日军阻袭折回济垣路以北地区。

奉命渡河南撤的国民党突围部队,沿途无不受到日军截击,加之缺乏渡河船只,部队损失惨重。第 14 集团军总部及第 15 军军部就是靠仅有的两只小船(每只仅能容 7 人,往返需 1 小时)往返数十小时,至 26 日才脱险南渡。

中条山战役中,八路军对友军进行了积极配合。会战初期,陈赓太岳部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了同蒲、白晋路南段破袭任务,从侧面牵制日军。5 月 22 日以后,八路军为团结对敌,应蒋介石要求,在平津、平保及太原北铁路线部署了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并在临汾、安阳南北,进行灵活出击,使日军交通中断二三日,拔除了中条山根据地日军的一些据点,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南撤的国民党军队^①。

中条山战役从 5 月 7 日开始至 27 日战斗结束,中国军队阵亡 42 000 余人,被俘 35 000 余人,日军伤亡 2 800 多人,以近 1 比 20

^① 陈廉:《抗战时期我党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战略部署》,《近代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第 43 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的极小的伤亡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所有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条山地区，他们惊呼：“这是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①

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十多万军队被日军击溃，固有战区长官战役指挥失当之处。但晋南守军消极抗战疏于防守、士无斗志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保存实力准备反共的政策造成的。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系较好，驻守山西境内的双方军队也能在抗击日本侵略的共同目标下，互相支持。但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在“反共”、“限共”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在政治上取缔共产党的抗日民众运动及所组织的抗日群众团体；军事上，严禁第18集团军的发展，不断制造与八路军的摩擦事件。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的大规模武装进攻，八路军被迫反击，日军则乘机向中条山侵犯。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停止追击，另一方面分别与阎锡山、卫立煌休战谈判，结果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商定以汾河为晋东南和晋西南的分界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地区，晋东南、晋西北为八路军与新军活动地区。卫立煌对“反共军事行动并不积极赞成”，^②而蒋介石为实施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不断从晋南抽兵增援黄河西岸兵力。据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称：“战区自28年后，由晋南调出者，则有第2、第4、第22各集团军全部，第5集团军之第14军，第36集团军之第47军、第76军。而只代以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战史室：《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整战》，第3卷，第2分册，第132页。

^② 《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1941年3月22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第320页，人民出版社。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第 80 军之两个师与第 34 师。因敌人之日渐推进，我军工事之增加，其需要兵力，在原则上原应随时日以俱增，方合时势上之需要。但以倡导晋南军队太多之声浪日益高涨，致晋南作战军迭次抽出，以致防广兵单，既无纵深兵力，复无控制兵团。故一经接触，短期内预备队即使用罄尽，致难与进犯之敌作长时间周旋。斯种情形，迭经多方请求陈述各在案，终以后方无兵击未果。”^① 蒋介石坚持防共抽兵，增加了中条山会战机动兵力转运的困难。1941 年 3 月，日军重犯中条山的迹象已很明显，各地不断有敌情上报，而蒋介石却置之不顾，一再敦促卫立煌所属庞炳勋、高树勋部，限期由晋南、豫北入冀，继续进攻八路军。尽管庞、高强调“林县、平顺以北奸军（诬指八路军）封锁极严”，“入冀通过较难”，卫立煌也表示：“待及晋南敌情稍缓再饬令各部相机北进”^②。可蒋介石仍不满意，严令卫立煌查明不能按期实施的原因。同时，对国民党杂牌部队亦采取严行监视，一经发现“亲共嫌疑”，即送往重庆“受训”或送劳动营“改造”，致使晋南前线国民党“干部方面”有“若干分赴多方面受训”，使得“指挥机构，又失去若干效能”。^③ 中条山战役开始前不久，军统特务首领康泽向国民党军委会军令部密报第 4 集团军孙蔚如部“有倾向中共嫌疑”，建议将部队“调长江以南分割使用，积极改造”。^④ 军令部旋即电令卫立煌核办。卫立煌根据前线

①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1941 年 10 月 28 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 1025 页。

② 《卫立煌呈复冬申令一元度电》转报《高树勋所据奸党不法动态并意见之陈述》，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1941 年 10 月 28 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 1026 页。

④ 《中国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康泽致何应钦电》（1941 年 1 月 27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敌情，对这种瓦解军心的作法提出异议。他在给蒋介石特急电文中指出：“查该部所有左倾之嫌疑分子大部已送中训团，一部送劳动营感化，目前可无顾虑，且无部队可接防，以请免调。”这样，才对孙蔚如部“暂准免调”。^①

1941年4月，中条山周围已集结数万日军。敌兵压境，国民党仍念念不忘反共。4月18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的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检讨会上，一开始便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要求各战区“先将晋南方面敌情、匪情及该方面地形详细报告，然后再谋防匪驱敌之方”^②，致使讨论瓦解共产党问题成为中条山地带作战会议的重要议题。而山西境内的阎锡山部队与卫立煌军队又无意合作，使会战区域内的“晋南军环境关系，甚难获得政治上的配合”。加之“作战军编制待遇未能一律之影响”，部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疾病、逃跑等缺额随之增加”。^③这样的军队千里馈粮、背水列阵，安有不败之理。

本 章 小 结

日本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战线拉得很长，无力再在中国战场进行大规模全面的战略攻击，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在新阶段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经过一系

-
- ① 《何应钦致卫立煌电》（1941年2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② 《对晋南三角地带作战之第一次检讨会》（1941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③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1941年10月2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025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列诱降活动，终将国民党内对抗战前途感到迷惘无望的汪精卫集团拉下水。

汪精卫集团投敌后，与南北的新老汉奸组成了“国民政府”，成为日本侵华的工具。虽然汪伪政权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但它的建立及存在，仍给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增加了不少困难。

国际上，英美等国对日本侵华曾一度持续绥靖观望的态度，甚至企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日本保护其在远东利益，做出诸如封锁滇缅路等伤害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事，对中国的求援亦甚为冷淡。然而，随着日本侵华程度及对英美在华利益侵害的加深，双方的矛盾激化，英美援华的态度趋向积极。至太平洋战争前夕，英美都对中国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而且，欧洲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也逐渐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进行了必要的经济、交通方面的调整和建设，以应付长期战争之需。但随着日军军事进攻力的减轻和国际局势的好转，加上初期抗战中损失很大，国民党在抗战策略上有了变化，开始消极起来。

1940—1941年的正面战场上，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只是为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或为保护其占领地的安全而发动了一些时间和地域都有一定限制的局部攻击。中国军队被动应战，有一定损失，但由于日军力量有限，主动脱离战场，所以双方形成了拉锯战，攻防态势及战线并没有多大变化。